

歷史的 愛傷

董每戡的
最後二十四年
(1956-1980)

陸鍵東
著

目 錄

前 言	001
序 前奏	003
第 一 章 中國學人的縮影	035
第 二 章 歷史靈魂的交戰	069
第 三 章 帷幕拉開了	095
第 四 章 風暴下的人和事（上）	123
第 五 章 風暴下的人和事（中）	151
第 六 章 風暴下的人和事（下）	183
第 七 章 士魂已死	201
第 八 章 唾棄	231
第 九 章 歷史分水嶺	255
第 十 章 「楚有湘纍漢逐臣」	271
第十一章 沉浮	293
第十二章 時代的近身肉搏	325
第十三章 北京的戲局	365
第十四章 「來日大難」	393
第十五章 停滯的年代	439
第十六章 幻滅下的另一種精神史	459
第十七章 世變	489
第十八章 易代	517
跋	543
附錄：本書主要參考文獻與書目	545

前言

這是一部二十世紀某段歷史的不尋常之作。

在二十世紀中葉，「二戰」後東西兩極集團的劇烈對抗，牽動全球，屢將世界扯入毀滅的邊緣。在中國，風雲跌宕，時勢如濤，淹盡眾生。風雨雞鳴，思見君子。歲寒後凋，高尚儀刑。中山大學教授董每戡，作為本時期一位高級知識分子，身逢際會，橫跨兩朝；生於憂患，成於劇變，毀於風潮，喪於易世。名雖不彰，然受盡時代風暴吹折，演繹盡二十世紀中國士人起始承恩輕狂，復臨難不屈，終至死不回的气節。並以其屢被拋棄的奇異命數，幾涵蓋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際遇，濃縮了一個世紀的無情與哀愁。實為敘述這段歷史的不二人選。

余讀其人，每感錚錚有骨，蕩氣迴腸。每審往史，凝滯沉抑，揮之難消。狀人，驚心動魄，隔世猶見苦寒之色。述史，身在其中，驚濤駭浪，噤不得發。

本書從1998年立意算起，迄今已整整十八年。十八年來多番掙扎，屢遭困頓，幾度面壁，無盡塗抹，終難捨棄。人與文，今與昔，時與勢，長年糾結為一個寫家的痛史，已化為今昔延續的一部分，赫然可見歷史的鮮血。至今仍能前行，乃是每當頹然欲廢時，總思及唐人柳宗元所云「思報國恩，獨惟文章」。此為余一生心儀之句，徬徨時誦之倍感溫暖。

2016 年夏，此歷經磨勘之稿，由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允為付梓。
一代著述，幾經沉浮，由是得以面世。語云：斯文尚在，史猶未沉。
此千載「為天地立心」士人之寄也、望也、志也。可感焉！

刊佈在即，爰書數語，以誌成書之慨。

陸鍵東謹識於廣州東觀堂

2016 年 9 月 19 日

序 前奏

一

歷史是由許多個故事組成。

每一個故事都有各自的撲朔迷離，都留下了大大小小的謎。故而歷史總如深邃無盡的宇宙，總令遙望者迷離，真相或永遠虛幻，惟一真實的只有一種軌跡——那是關於人和事如流星一般的軌跡……

1957 年是一段特別的歷史，深埋著無數悲歡離合的故事。自然，1957 年，也如流星在無邊的蒼穹，留下了一條仍在遠去的軌跡。

1957 年的中國，正處在一個歷史的轉折關頭。不少現代史研究者，在談到 1957 年前後的中國命運時，喜歡將 1956 年 2 月發生的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大會的「秘密報告」，以及隨後引發的「東歐事件」，作為此時中國社會進程的重大誘因。其實，1956 年「華沙條約組織」發生的一切，俱與中國大陸的變動沒有可比性。早在 1955 年下半年，中國共產黨一些領導人就感覺出轉型中的社會，已出現一些新的矛盾，已決定調整知識分子政策。也就是說，中共預知的並非是東歐的西化浪潮，而是一個新政權要建立牢固的基礎所面臨的必然趨向。1956 年 1 月，中共中央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因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中國自 1949 年後第一次出現了國家政權以經濟建設、追求和平幸福為理想的國勢轉變。1956 年 5 月，秉承毛澤東的意思，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

定一發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演詞。從 1956 年春夏之交開始，這個經歷了整整七年時間因顛覆原有社會基礎，改變人與社會舊有關係，而將弓弦拉得很滿的國家，第一次呈現出一派祥和的氣氛。不管最高領袖此時提出的「雙百」口號，與知識界所理解的「雙百」含義是否存在著實質的差別（就是這種差別引發了以後的歷史）——1956、57 年之際的中國，出現了從中央到民間，從追求思想統一的執政者，到打上各階級烙印的各色人群，都上下同聲共氣，感受著社會正在飛躍的溫熱場景；描繪了許多年的自由、民主、進步的美好圖畫，現出了輪廓。

這種歡樂，甚至藉著中國傳統新春佳節的到來，送舊迎新的喜氣猶未散盡，又捲起了一個高高的浪頭。¹ 在 1957 年的二三月間，北京召開了幾個重要的會議，其中在 2 月 27 日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毛澤東主席專門作了「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的報告。這個報告在當年牽動了世界的目光。遠的不說，它開啟了該年中國時局風雲的大幕，譬如一齣扣人心弦的大戲，劇情的跌宕起伏，不惟使戲裡戲外的人大感意外，身處其間不能自拔；它同樣使「寫戲者」身不由己地只能順著戲理的發展²編寫下去。即使在政治領域，戲劇永遠是源自「歷史」，又高於「歷史」。

毛澤東主席是日的報告，在當年已是引人關注，世界列強在數月內急於要找到這個傳說表現了「新思維」的文本。直到在 1957 年 6 月上中旬，由美聯社從波蘭人的手中獲得此報告的內容並公開，遂在西方引起軒然大波。此為後話。在中國，2 月 27 日現場聆聽毛澤東演講的人將近兩千。三天後，即 3 月 2 日，同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再次作了觀點相似的演講。3 月 6 日至 13 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文教戰線一批著名人士受邀與會，他們或現場親聆毛在會議上的再次演講，或聽到了 2 月 27 日報告的錄音傳達。在短短的半月時間裡，年已

1 1957 年又是舊曆丁酉年，其正月初一是公曆 1 月 31 日，元宵節是 2 月 14 日。全國政協委員們在 2 月中下旬已紛紛抵京，做著參加政協會議的準備。

2 從這個意義上說，昔日的戲劇多以連本戲的方式表演傳奇，甚得世事與人事的真味。

花甲的毛澤東，密集地作了多場公開性的演講。¹ 嚴寒未盡，春雷驟然從天深處翻滾，1957年的「異相」於此可見一斑。自此，「毛主席大力提倡『雙百』方針」（時人語），在全國知識界迅速傳遍。此實為兩個月後數百萬知識分子敢於「大鳴大放」的直接誘因。何曾想，在矛盾對立已達沸點的6月19日，毛主席的報告以《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為題公開刊行，詞句趣旨與一百多天前相比出現重大修正。這是一段五十年來一直未得到釐清的歷史公案。

真相到底如何？

1957年3月上旬，全世界的中文報紙或許僅有一家報社獲得如此重大的獨家報道，從而也為歷史留下了原始的面貌。3月8日，香港《文匯報》在頭版頭條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 / 毛主席講十二問題 / 政協委員深受鼓舞 / 都說毛主席和藹親切，以誠感人，以德化人》為題，² 首次公開報道了毛澤東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就當前國家和人民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十二個重大問題講了話」。這是一篇很見匠心的報道，茲引錄其主要內容如下：

「是莫大的鼓舞，也是最深刻的教育。」——出席政協全國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的人士聽了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後，一致這樣表示。這次政協全會是全國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開幕前夕，毛主席召開了最高國務會議，就當前國家和人民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中的十二個重大問題講了話。全體政協委員都被邀列席這次會議。這就使得這次政協全會更引人矚目。

這幾天，無論在政協委員們的寓所或他們進餐活動的場所，毛主席的講話都成為他們談論的中心。前國民黨水利部長、著名的律師薛篤弼談到他參加最高國務會議的印象時，連連說：「毛主席講話時態度和藹，

1 多場演說均有統戰對象、港澳名人與會，故毛澤東是有意藉這樣的場合公開他的看法。

2 見1957年3月8日香港《文匯報》第1版。標點符號為著者所加，原為肩題、正題、副題或空格。另：該報道的來源「本報北京七日專電」八字，特以大號字體標印，且套為紅色，亦為稀見。

親切，虛懷若谷，如談家常，又似和友好促膝談心，真如沐春風化雨之中。」他又說：「毛主席講的十二個問題，都是用唯物論辯證法來分析問題，特別對敵我、是非兩種矛盾的分析，對民主與專政問題的分析，對我們教育意義最為深刻。」他認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等方針都是完全正確的。「這是毛主席以誠感人，以德化人。」去年從香港歸來的前國民黨徐州「剿總」副總司令陳書農，這次是第一次見到毛主席，也是第一次聽到毛主席講話，對毛主席的和藹態度覺得「感人至深。」他說：「毛主席講的十二個問題，要大家分敵我、辨是非，實際上是做人做事的道理。在這次最高國務會議上，毛主席把中國的大小事情，人民大家的事情，民主黨派的事情，不論好的或壞的都講了出來。我經歷過過去的舊時代，像這樣有如家人團聚，無話不談的情況，卻是從來沒有過的事情。」特別邀請人士張志和聽了毛主席的講話，興奮得通夜睡不著覺。他在一次座談會上表示：「毛主席儘管是談笑風生，但給我們今後工作以很大的鼓舞力量。這力量從哪裡來？是毛主席教給我們以馬列主義，教給我們運用唯物論辯證法。」

(下略)¹

在「兩極對抗」的年代，彈丸之地的香港，在大陸、美國、台灣三方幾十年牽動著太平洋地區神經的角逐中，一直扮演著僅此一塊各取所需的緩衝地帶，從而在中國現代史上留下了無可替代的地位。比如香港《文匯報》這篇報道，毛澤東的態度，令與會者「感人至深」；在議政中，傳統的「君臣廷對」變為讓人有「如家人團聚」之感。如是記錄，確然只有在香港才可一見。

今檢毛澤東主席 2 月 27 日演講報告的原始記錄，文長近兩萬字，雖云語涉「十二個問題」，然通篇之趣味只有一個，即幽默生動，談笑風生，茲節錄一段落如下：

1 見 1957 年 3 月 8 日香港《文匯報》第 1 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 / 毛主席講十二問題 / 政協委員深受鼓舞》一文。

老幹部能不能批評？批評的問題，從馬克思以來沒有一次說過要分新老幹部，說只能批評新幹部，不能批評老幹部。我們憲法上規定，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那麼共產黨員在犯錯誤這個問題上，也應該是平等的。有一批人是共產黨的老幹部，或者是民主黨派的老幹部。因為他們老，所以就享受一種不受批評的權力，可不可以？我看是不行的。你活著不受批評，你死了以後，人家還要批評你。我們就批評過死人，批評過孔夫子。孔夫子死了幾千年，還要批評他。斯大林也是死後被批評的。活人也能批評，死了的人也能批評，這不是官職大小，年歲長短。（中略）憑老資格吃飯可不可以？憑老資格可以，這一點應承認。因為他老，活了那麼大，他也不死，於是乎他有點資格，有點作用，還可以起點跑龍套的作用，幫助人家。我看梅蘭芳就跑過龍套，跟人家合作，拿個刀站在那裡。今天在座的有沒有梅蘭芳先生？我看你到了八十歲還可以起點跑龍套的作用。我這個人的作用，就只能起一點跑龍套的作用。至於唱主角我是不能唱了，那是我們周總理這些人物，你們各位了。《西廂記》裡那個「紅娘」我是不能唱了（笑）。我的角色是個甚麼角色呢？我是那個老夫人的角色（笑聲）。《西廂記》裡那個老夫人出來，唱上那麼幾句就進去了。你如果盡唱，唱得多了，人家就要趕你走的（笑聲）。老資格不管你怎麼樣，你辦事要對，要正確，你到九十九歲是正確的，到一百歲那一天，你作了一件混蛋的事，那你也是不行的。¹

兩相比照，香港《文匯報》所云毛主席「虛懷若谷」、「以誠感人」、「以德化人」，洵非虛誇。

世上本就沒有無緣無故的新聞，香港左派報紙關於毛澤東主席的報道，絕非無因，它顯然與1956、57年之際北京呈現更為開放的氣氛有關。在1957年1月6日的香港《大公報》上，刊發了一篇《毛主席學英文》的

1 笑聲，指與會者笑聲。見《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記錄稿（傳達文件），1957年4月打印。本書所引毛澤東主席的講話與言論，全部採自五、六十年代黨內印發的學習材料與閱讀文件。當年印發這些材料，與形勢、運動戚戚相關，有很強的時效性，它們留存了最真實的史跡，故而完全是歷史的一部分。本書摘引，純從史料學的角度證史。

參加全國婦女代表大會

[illegible][illegible]

Wen Wei Po
4 Percival Street, Hong Kong
司公限有報聞文：印承及印堂
號五四一三第字港
號四街富斯波港香：址館
〇九五〇七七：話電部總
〇九六〇七七：話電部總
三二九〇七七
號二坊二路吉寧：處事辦州司
二二二二一〇一：話電
二二二二二〇二：話電機電
香港普德大藥經出司公

[illegible]

008

獨家報道。它記錄了周恩來在「緬甸華僑歡迎周總理大會」上所講的一段話：「很多人在外國居住了幾十年，他們卻不懂得一句外國話。有的說：年紀老，學不好。我看不見得。我舉個例吧，你們一定很相信毛主席，毛主席年紀大了，他現在六十三歲了，他還在學英文（在座的華僑這時響起了熱烈的掌聲）。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五年計劃，李富春同志的五年計劃的報告，最近我們黨的『八大』等幾個報告（英文譯本），他（毛主席）都在那邊讀，他記得的單字比我記的還要多，我比他大大的落後了。為甚麼我要說我落後？因為我有許多場合碰到外國朋友時可以說幾句，而毛主席沒有機會講，他也學，所以證明人是要學到老……」¹這樣的內幕新聞顯示，大國的國勢祥和，也必然影響著國際政治的祥和。

春來早、春潮急、春知道²……香港左派報紙實際很早就敏感地捕捉到變化的信息，這類報道，透露出世界局勢正發生新演化的跡象，新的中國在國際社會正滋生意想不到的影響力。

3月15日，香港《大公報》在頭版頭條以《毛澤東威望愈高》為標題，轉載了路透社駐北京記者的一篇專題報道。在此期間曾親眼見過中國偉人的記者，寫下了他對1957年初紅色中國與其最高領導人的直觀感覺：

共產世界最近發生的困難，對中國共產黨並無任何顯著影響，也沒有妨害到黨領導的團結。

這裡大多數的外交觀察家相信，中國是當真執行集體領導的，黨內要員對於重大問題的看法也非常一致。（中略）

然而，在政策和政府工作上的集體領導，完全沒有減低毛主席在中國的地位。毛主席無論在實際上或名義上都高出同僚之上，是當然的領袖。毛主席雖然把大部分的政府例行工作交給其他人處理，但他在黨的二十年的領導，加以分析和決定在實際上所獲得的成功，仍然是一切重大政策問題的最後決策人。（中略）

1 見《毛主席學英文》，載1957年1月6日香港《大公報》第3版。

2 俱為此時期人們對時代的讚美語。

（毛）在公眾場合出現時，他完全沒有政治煽動家的樣子。他有一種博大、沉著、不流露的尊嚴，看來就象一個老百姓。臉上帶著慈祥的表情，溫和易近。在群眾場合出現時，他受到熱烈歡呼，特別是青年和兒童向他熱烈地歡呼。他和他們談話時，總是認真專注，好像他們是平輩一樣。如果他在群眾中步行，數以百計的群眾會搶前和他握手，高興得跳上跳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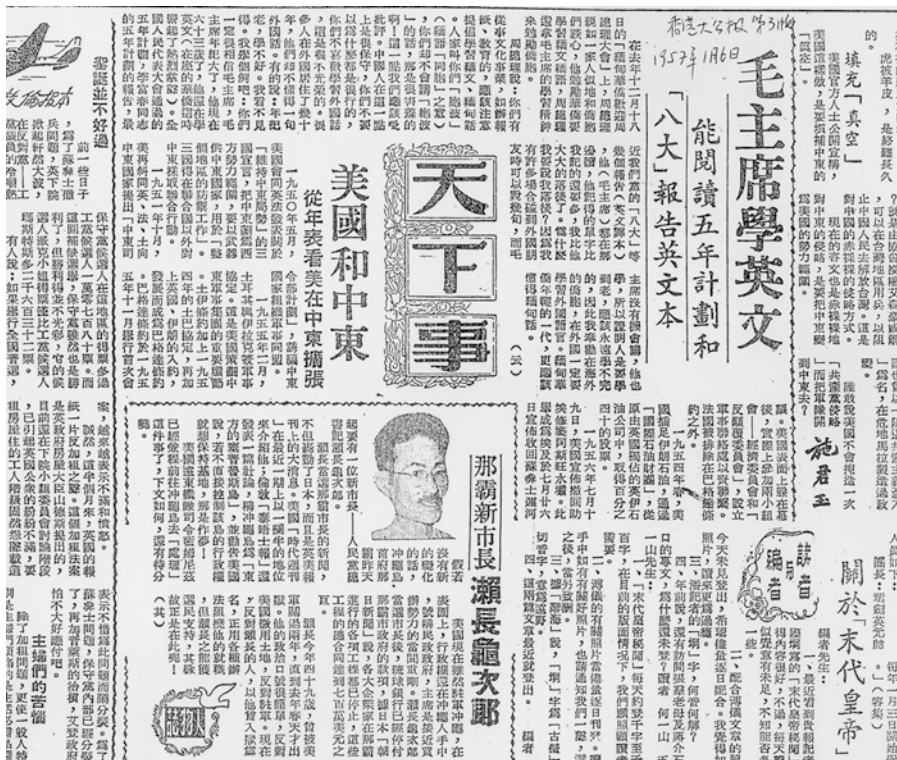
毛主席已達六十三歲的高齡，看來極其健康，如果三年前傳說他病重的消息屬實的話，他必然是完全康復了。因為他過了六十還開始學英文，同時據說他還學游泳。去年曾經和他談過話的印度代表團團員說，他曾經告訴他們，他最近曾游過長江。¹

這篇出自西方記者之手的文章，儘管不免有隔膜之詞——比如毛澤東早年已知水性，非晚年才學²，然通篇報道仍濃烈透現出處身中國大陸的外人，也為 1957 年早春的中國氣息所感。許多年後，一些劫後餘生的親歷者，都先後追述過 57 年春天中毛澤東那數場「令人如沐春風，無限溫暖」的演說報告，以反襯隨後突如其來風暴的奇詭。其實無論故事中的故事有多少，其中有一樣時代的底色是質樸與不會改變的，那就是如路透社記者這個局外人所感觸到的那樣，在 1957 年的早春，「毛澤東威望愈高」，「共產世界最近發生的困難，對中國共產黨並無任何顯著的影響」³。這是一篇可以為歷史某一時刻定調的文章。

1 引文為節錄，見 1957 年 3 月 15 日香港《大公報》第 1 版。報紙未署撰稿者名字。據相關史料，五十年代中期，英國路透社駐北京記者僅有中文名字叫「漆德衛」者一人。

2 所云毛晚年「還學游泳」，準確的表述應是從五十年代中開始，毛澤東已有條件重拾早年喜戲水的愛好。

3 甚至在傳統中國的「盛世」意象中，2 月 27 日的北京充滿了「天道吉兆」。據畫家傅抱石在大鳴大放初期追述，「我們聽毛主席報告那天，適巧大雪紛飛，可是毛主席的報告感人肺腑，使人覺得溫暖如春」（見 1957 年 4 月 25 日上海《文匯報》第 1 版）。這暗喻著「大雪兆豐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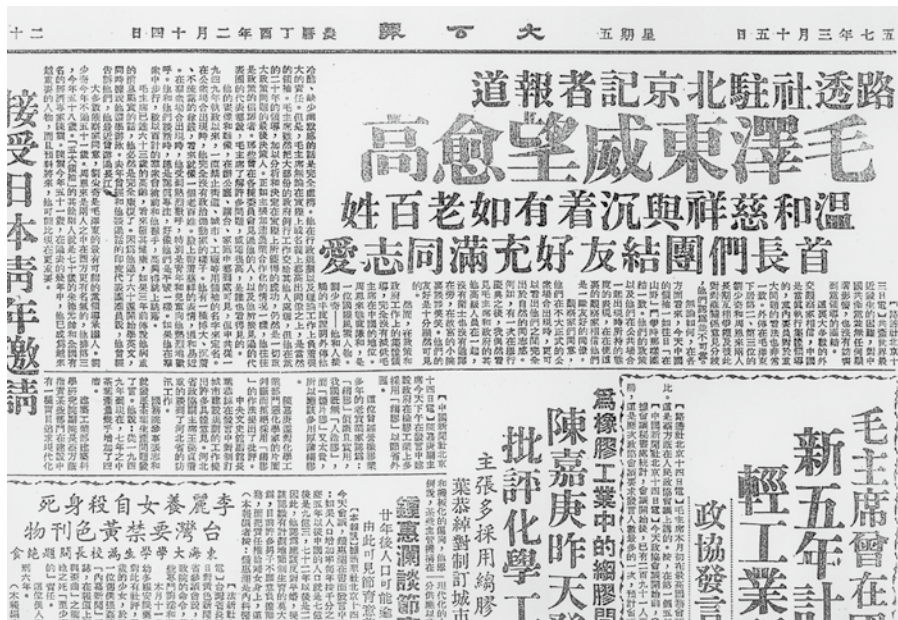
1957年1月6日香港《大公報》關於「毛主席學英文」的獨家報道

二

當然，歷史是有過程的。

在1957年的早春，有這樣的局面，從最高統帥的角度，這是鬥爭得來的結果。實際上，在這個激動人心的變革時刻，也交織著「矛盾、較量，進而形成新的局面」這樣的軌跡。

在六十歲以後，最高領袖急於進入社會主義的更高層次，急於看到新型社會更可觀的成果。在1955年，在中國農村關於「合作化」、關於「社會主義高潮」等問題上，毛澤東以澎湃的激情先後寫下了幾萬字的文章或按語。這是很見真情的文字。常常不自覺流露出他的「苦口婆



1957年3月15日香港《大公報》頭版轉載路透社消息「毛澤東威望愈高」

心」，引導全黨要當「促進派」。而就國家政權結構整個大勢來說，隨著國內外多個局部戰爭的結束，中國共產黨由戰時高度集中的軍事集團模式，向現代政府執政架構的過渡取得成功，政權內部的分工開始明確，戰線條塊管理程序逐步按部就班，這些，都使對「高度集中」極為熟手的領袖那急於要實現的雄圖大略遭到頓挫。這樣就出現了似乎很難理解的一種矛盾現象：這位超出同儕的黨主席，威望愈高，他卻感到對國家建設的控制力點點旁落。

從1955年下半年起，毛澤東不僅極力推動「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運動，而且公開批評整個國家在所有領域發展上都存在著「對於情況估計不足的缺點」¹。毛所說的「估計不足」，即對「空前高漲的生產積極性」視而不見。認為原計劃中要若干年才能平穩實現的「三大改

1 見《〈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序言》「序言二」，1955年12月27日寫。

造」應當提速完成¹。在 1956 年上半年，中共黨內已形成有代表性的不同聲音，總其觀點就是：經濟建設不要盲目冒進，「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周恩來語）²。這就是在黨內「冒進」與「反冒進」的兩種建設思路的碰撞。黨內那些贊同「不要冒進」的高級幹部或者沒有意識到，他們極力糾偏，卻是傷害了最高統帥。在一年多後，重返主抓國民經濟生產第一線的黨主席，終於在 1958 年上半年多場中央會議上，一抒抑鬱心頭有年的不滿，說出了以後廣為人知的一些名句：

「不要提反『冒進』這個名詞好不好？這是政治問題。一反就泄了氣，六億人一泄了氣不得了。」「這三年有個曲折，右派一攻，把我們一些同志拋到距離右派只有五十米遠了。右派來了個全面反『冒進』。」³

毛澤東當然是有大局觀的人物，但在此後長達兩年的時間裡（1958—1959），只要觸及到被「反冒進」的傷心處，最高領袖便馬上舊事重提，重複敲打。研讀這些心聲，大致可推知此前這位已不具體直接抓國民經濟的領袖，在這個轉型期的一些真實狀況。

這樣，在 1956 年，隨著歷史轉型期的明朗，政治統治權開始露出苗頭的「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又簡稱作「三大主義」），在毛澤東的眼中兼有著另外的含義。當黨外形成對現行體制抱怨的聲浪時，他透過現象看到的是這樣的本質：思想不統一，隊伍不再步調一致。

今天看去，歷史為這段時期毛澤東的「鬥爭史」留下了一個絕佳的案例，那就是在五十年代相當範圍內已人所共知的「毛主席狠批《人民日報》」公案。在 2 月 27 日的演說中，毛澤東提到了四位部隊文化人，該四人在 1957 年初的《人民日報》上撰文「懷疑『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個方針」⁴，毛澤東在批評了四位作者「結論作得過早一點」後，接著如是云：「現在這麼久了，《人民日報》對這件事抱的甚麼態度我也不

1 即「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2 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55—1956 年」條，熊華源撰稿，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 年版。

3 《毛主席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1958 年 1 月 11、12 日。

4 即陳其通等四人在 1957 年 1 月 7 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我們對目前文藝工作的幾點意見》。

清楚。在一月中旬和下旬開的省市委書記會議上，我把他們的聲明（按：指四位作者之文）印出來給大家看了。當時有《人民日報》的同志在座。他沒有表示甚麼態度。現在又過了差不多一個月了，究竟《人民日報》發表這東西是贊成還是反對？我現在表示我的態度：我不贊成那篇文章，那篇文章是錯誤的。」

這是最高領袖首次公開表達他對中國第一大報的不滿。在場的聆聽者恐怕很少有人能聽得出弦外之音。時《人民日報》的負責人是鄧拓。鄧拓政治嗅覺遲鈍，令他在接下來的日子再次犯下大錯。已遭黨主席痛批的《人民日報》，在是否宣傳「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問題上，再一次毫無動靜，沒有表示態度。據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二十多年後回憶：

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原來我整理了一個稿子，他說先放一放，只發了一條很短的消息。他到上海以後，一看《文匯報》、《新民晚報》搞得很熱火，《解放日報》、《人民日報》按兵不動，他就火了，就說要搞大鳴大放。¹

《人民日報》與《解放日報》是黨報，黨主席的聲音竟然沒有被黨報傳出。胡喬木以「火了」二字形容，很傳神。當年一份記錄稿，詳盡錄下 1957 年 4 月某日毛主席在召見有關人員時對鄧拓的怒火。十一年後，已由中央文革小組牢牢控制的《人民日報》，將毛主席這段批評公開刊佈，所謂鄧拓「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被公示天下。現摘引該史料如下：

（按：以下是毛澤東主席的批評）黨的報紙對黨的政策要及時宣傳。最近對黨的政策宣傳，《人民日報》不是沒有抓緊，而是沒有抓。從刊登陳其通的文章和最高國務會議以後，《人民日報》無聲音，非黨的報紙在起領導作用。黨報被動，整個黨的領導也被動。過去說是書生辦報，現在應當說是死人辦報。你們到底是有動於衷，還是無動於衷？我看是無動於衷。

1 《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29 頁。

宣傳工作會議未登消息，是個錯誤。這次會議是黨內外人士合開的，為甚麼不登消息？最高國務會議為甚麼不發社論？為甚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這裡有鬼，鬼在甚麼地方？（中略）¹

鄧拓受到了毫不留情的訓斥，看似是《人民日報》已遠遠落後於日見高漲的鳴放形勢，實際毛主席的強烈不滿另有無人能察知的原因，那就是他強烈感到已經推不動這張報紙。他的兩句氣憤話透露出個中消息：「最高國務會議為甚麼不發社論？為甚麼把黨的政策秘密起來？這裡有鬼，鬼在甚麼地方？」黨主席所說的「鬼」，最低限度表達了這樣的憤怒：他的說話與想法，居然有一種無形的力量（「鬼」）可以置之不理。

1957年，的確是中國發展走向舉足輕重的一年。

鄧拓在三四月之間的遲疑，與他了解黨內高層對一些問題有不同看法有關。更重要的一點，此時中國共產黨是「集體領導」的意識尚濃厚，黨主席此時尚未到一言就可推翻重要的集體決議的地步。胡喬木晚年這樣總結云：「1958年反對冒進，這個影響就比較大了，黨內的集體領導就受到了非常大的損害，這個時候就形成了一種局面，就是毛主席的話誰也不能反對」²；「發展到像1958年在中央就不太容易平等地跟毛主席討論問題。」³

胡喬木關於「黨內的集體領導」變化的回顧，重現了這樣的情景：至少在1957年初，「平等地跟毛主席討論問題」尚不至很困難。鄧拓按兵不動，尚有這樣客觀的政治環境。這樣，黨內最高核心成員日漸明確的分工，與隨之而來「集體領導」意識的自覺，與最高統帥深心處日感「說話無人聽」的憤怒，構成了只有一個人知的心靈交煎。毛澤東要藉發動黨外人士、知識分子「鳴放」之外力，一攻黨內他以「三大主義」名之的不良作風。

1 毛澤東：《對〈人民日報〉的批評》，落款時間是「1957年4月」，載《毛主席論報刊宣傳》，北京：人民日報編輯部編印，1968年4月版。

2 見前引《胡喬木回憶毛澤東》（增訂本），第679頁。

3 見前引書，第682頁。

但是，這還不是這一著名事件的全部內容。

歷史還有同樣真實而讓人意想不到的另外一面。那就是當最高領袖痛責《人民日報》的時候，幾乎是在同一時刻，卻對另一張有資產階級歷史與味道的報紙，毫不吝嗇地送上讚揚。這張報紙，就是上海《文匯報》。

這是迄今為止鮮有史家將這兩件事聯繫起來考察的一段奇異的歷史，此中之波瀾，半個世紀仍未被發覆。¹在此風起雲湧的關頭，最高領袖在不同的場合對兩張各自有代表性的報紙「一批一讚」，代表了事物的兩個極端，足以反映出 1957 年「時運的詭異」。

《文匯報》為何能出彩？

今天即使僅僅按當年人人可與聞的材料細細鋪排，向未被勾稽的史實馬上呈現其從未被揭露的一面。

1957 年 3 月 3 日，全國各大報紙均以「新華社北京 2 日電」的來源，統一報道最高國務會議舉行擴大會議，「毛主席就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了話」，這是新聞通稿中唯一透露毛在 2 月 27 日作了報告的一句話。3 月 3 日《文匯報》的報道自無例外，但在其招牌欄目「編者的話」中²，《文匯報》另以《照耀前進》為題，對此作了獨家發揮：

毛主席最近召集了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出席會議的各方面人士共達一千八百多人。這反映我們的民主生活是多麼豐富而深厚。

去年，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對於繁榮我國的文化科學事業、鞏固我國的人民民主基礎，起了極其巨大的推動作用。

可以想見，毛主席在這次擴大最高國務會議的講話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的。³

1 毛澤東稱讚《文匯報》，從未正式刊佈，蓋因數月後他對《文匯報》的評價急轉彎，故領袖的讚語只在徐鑄成等人的回憶文章中有記載。

2 據該報老輩報人回憶，要聞版裡「編者的話」，是編者每天就一二要聞有感而寫的小隨筆，筆鋒犀利，很受讀者歡迎，在徐鑄成時代，多為徐氏手筆。

3 見 1957 年 3 月 3 日《文匯報》「編者的話」。

短短百餘字，已將政治要素中的「人、事與承前啟後的意義」概括出。也是這短短百餘字，飽含感情的「毛主席」一詞共三見。最重要的是，《文匯報》3月3日對毛澤東主席2月27日報告的評述，不僅全國唯一，甚至在未來若干日子內仍保持著這種唯一，而且在這稀有的第一聲中，《文匯報》已經預言了毛主席講話「是有非常重大的意義」。

3月5日，全國政協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開幕。是日《文匯報》頭版頭條，再次運用毛的講話精神對本次政協的熱門話題作了深度的分析。這在全國也屬僅見。

3月8日，政協會議進入大會發言階段。從3月9日起，《文匯報》對政協會議的報道另闢蹊徑，以生動的筆觸，大力報道罕能入「新華社通稿」法眼的小組發言。¹這些最為自由活潑的討論，因毛澤東講話已在知識界上層營造起「百家爭鳴」的氣氛而直見57年初春最真實的中國社情。²與同一時候《人民日報》等黨報沉默不作聲相比，兩者對毛澤東講話的態度，有霄壤之別。

3月14日，《文匯報》獨家報道《毛主席游泳渡湘江》。這是一篇見出新風的報道，它的運筆有別於其時已盛行的「頌歌式」寫法，卻又在淡淡的描述中展現了領袖的風采。³

3月15日，《文匯報》頭版頭條以「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之法，從眾多政協委員的發言中，單獨挑出《學術界人士暢談「百家爭鳴」》一條，首次將毛澤東報告在知識界引起震蕩的消息公諸社會。⁴此中的重頭人物為馮友蘭與陸侃如兩氏。《文匯報》又創下了當時全國新聞報道中的

1 這是徐鑄成的獨創，故多獨家新聞。

2 3月9日的《文匯報》對此形容為「『子欲無言』，其可得乎？」

3 現全文刊錄如下：「【本報長沙專訊】毛澤東主席去年到湖南，曾在長沙游泳、橫渡湘江。湘江為湖南四水之首，江面寬闊，水流湍急。毛主席從長沙南門外的猴子石河邊下，游泳到嶽麓山下的對岸，費時五十多分鐘游畢全程。當時有人說，湘江水漲，不便游泳。毛主席舉莊子『逍遙遊』篇中的：『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兩句以為答，認為水深才好游泳。」

「今年一月出版的『詩刊』上，發表了毛主席的十八首舊體詩詞，其中一首『游泳』，頭兩句是：『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這是毛主席親身體驗有感而作。」

4 報道中有句謂：「自從大會發言以來，專談『百家爭鳴』本身存在的問題的，這還是第一次。」

一個「唯一」，分別以一千四百餘字和一千八百餘字的篇幅，突出摘刊了馮、陸兩人的發言。¹其中陸侃如在發言中直言批評《人民日報》，有語云：

（對於「雙百方針」）我敢斷言學術界絕大多數是衷心歡迎的，因為這方針大大地鼓勵了我們的積極性與創造性，把我們從重重束縛、重重顧慮中解救出來。現在並不是這方針做得過分的問題，而是宣傳貫徹得遠遠不夠的問題。我們要求人民日報和其他報刊、雜誌的編輯同志們，要在這一點上起帶頭作用，首先解除你們自己的顧慮，然後才能免除讀者的誤會。在提倡自由爭論，鼓勵批評與反批評的空氣中，把文藝界、科學界的工作推進一步。²

這是今天所知在 1957 年 3 月公開批評《人民日報》宣傳「雙百方針」不力的第一聲。陸侃如做了無人敢做的一件事。毛澤東固然是在最高國務擴大會議上當眾說出對《人民日報》的不滿，只是與會者大部分是黨內高級幹部，其餘的黨外人士又盡是名人鉅公，不說當年無人敢公開追隨主席批評國家最大的喉舌，即使數十年後，當年該報如何不聽毛的招呼的內情，一樣罕有知情者作回憶反思。³

現在分析，直接給予毛澤東影響的，應是 3 月 12 日《文匯報》刊發了鄧初民氏⁴的一篇長文。這篇題為《聽了毛主席的講話以後》的文章，實際上是毛澤東 2 月 27 日所作報告的一個濃縮版，它以更為緊湊的行文綜述了毛氏報告的精華。全文以有限的篇幅，將該報告中各種政治元素拈而出之，並略有精闢的發揮。由是毛的思想，在被「不報道」的十二

1 若參照同日其他報紙仍按部就班的報道，《文匯報》直如鶴立雞群。

2 陸氏的批評算得上委婉。只有對政治敏感的人，才能從中察出端倪。儘管如此，該文的勇氣，仍令人驚詫，數月後陸侃如被打成全國知名的大右派。陸文題目為《學術界要打破顧慮，勇於辯論》。

3 所謂歷史的真實，首要之義只能是幾乎無法留存的如風而過的現場氣息。陸侃如這篇文氣甚為自然暢順的文章，實際反映出自 1956 年「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雙百方針提出」兩個重大事件出現後，知識階級重拾敢言豪氣的風尚。

4 鄧初民，生於 1889 年，長毛澤東四歲。鄧氏一生經歷複雜，與共產黨向有淵源，為一些民主黨派的重要人物。五十年代初鄧氏曾任山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山西大學校長等職。

天後，終於不走樣地昭示天下。現摘引該文一些語句段落如下：

毛主席在他的講話中，為我們指出：今天的中國仍然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王國。有小資產階級，就有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任何有思想的人，都要求表現他的思想，而且這種要求，都是很強烈的。你要把它壓下去，或者採取行政命令的方式，不讓它表現，也是不可能的，從而在今天就不免要在人民內部表現出無產階級、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思想矛盾，這種矛盾，就必須適當解決。但這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解決這種矛盾最適當的辦法，就是哲學、科學、文學藝術思想上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

所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是說，只要是「花」，就要讓它放，那怕是野草閒花，也要讓它放，何況我國的古代文化遺產和民間藝術，都是異常豐富多采的。

百家之中，在今天顯然還有許多唯心主義者，但他們在思想上是唯心主義，在政治上卻擁護社會主義，那麼，儘管矛盾是存在的，卻是人民內部的矛盾，而這種矛盾的解決，就只能採取說服的方式，講清道理的方式，也就是批評的方式。我們是決不能把人民內部的矛盾和敵我的矛盾混淆起來的。

為著使鮮花、香花、稻、麥、稷、黍得到正常和充分的發展，也必須對野草閒花等等加以清除。所以，在「百花齊放」的方針上，野草閒花，一面讓它放，一面又要清除；在「百家爭鳴」的方針上，唯心主義的各種流派，一面讓它鳴，一面又要批評。這就是矛盾。但只要是人民內部的矛盾，就要適當的處理。所以毛主席把批評看作是治病救人，不是一棍子把人打死。¹

這篇罕為後來研究者注意的文章，有比較可貴的一點，它還原了毛的報告的氣息：友善與祥和。在神州大地皆寂然無聲之際，該文是打破僵局的第一個驚雷。最高統帥意料不到，最能領會他心意的，不是黨的喉舌，卻是一份歷史複雜的報紙！對毛個人言，更為觸動心弦的恐怕是

1 載 1957 年 3 月 12 日《文匯報》第 2 版。

這麼一段文字：

毛主席這次講話，在分析問題時，具有高度的科學性與說服力，使人感到親切、溫暖、輕鬆、愉快，好像家人父子會敘一堂，在談家常瑣事和講有趣的故事，同時卻體現出了人人都懂得的真理，真正解決了問題。可以說，他的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對於我們都有很大的啟發和教育。其中使我個人感到最振奮的，卻是他的講話中處處都提到一件事的兩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譬如說，一個人一輩子不患病，那是很危險的，反之，常常有病的人倒不太危險。¹

1949 年後，最高領袖在億萬人心已擁有崇高的地位，絕大部分的感恩之詞均出自工農兵，在 1957 年前後，像鄧初民這樣背景的高級知識分子兼民主人士，公開說出「（毛主席）每一個字，每一句話，對於我們都有很大的啟發和教育」，不僅不常見，而且表明在國際社會主義陣營中已出現「反對個人迷信與個人崇拜」的潮流下，在黨內已不具體抓經濟建設的毛澤東，在社會上反而獲得了更進一步的崇拜。²

3 月 20 日，《文匯報》在第二版頭條刊發《上海 40 萬知識分子擁護黨的號召 / 科學研究思想論爭日趨活躍》的報道，此中最震撼的是大字標題中「40 萬知識分子」這一提法，突顯著「東南半壁，一柱擎天」的氣勢，十分撼人。該文資料詳實，徐疾有致，顯示作為中國最重要的現代化城市，上海人才雄厚，蘊藏著與眾不同的能量，它發出的聲音，足以震動四方。

最後，文中最有新意的一個內容是對閒置知識分子的重新使用與對

1 該段落有數語與前引 3 月 8 日香港《文匯報》的報道很相似，鄧時為民盟中央高級幹部，有資格閱讀到香港報紙。

2 鄧初民固然說出了毛澤東的心聲，但很顯然他卻得罪了民盟的鉅公。據徐鑄成數月後所作「我的反黨罪行」檢查謂，民盟中央認為鄧初民的文章「是教條主義，《文匯報》登這篇文章影響很不好」；羅隆基讓浦熙修傳話給徐鑄成，請他寫篇文章反駁鄧初民。由此可知中國政治社會的複雜，各種難以言說的因素交織。（徐鑄成的檢查見《徐鑄成自述：運動檔案彙編》，第 22 頁，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2 年版）

「肅反運動」善後的解釋。¹ 它傳達著非常明確的題旨：成千上萬的知識分子擁護中國共產黨，儘管兩者的關係還有不少可待解決之處，但只要黨以「團結互信」相待，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將「天下歸心」。

3月21日，《文匯報》再作重錘出擊，刊發駐京記者呂德潤「全國政協旁聽記」長稿、以及姚芳藻的特稿《進一步「放」/進一步「鳴」》。前者，呂氏早在十年前已是《大公報》名滿一時的記者，抗戰後期曾隨中國遠征軍征戰「緬印戰區」，採寫過一系列膾炙人口的戰地報道。在這篇將近二千字的長稿中，呂德潤用舉重若輕的筆觸，親切描繪了政協盛大的「歷史性的會議」（文內語）。呂氏全景式駕馭歷史場面的才能，使這篇在其時中國獨一無二的「現場實錄」，完全配得起它曾產生過獨領風騷作用的地位。² 茲摘引該文其中一節的精華內容如下：

……（在參加政協會議的人們中），穿著道服的委員在大會上介紹了道教的歷史；基督教徒在講壇上批評了某些不信神的人片面地曲解了「耶穌」的教義；民主黨派人士指出有些地方的黨員對黨外人士的「有職有權」的方針貫徹不夠；高級知識分子表示在團結、改造知識分子工作中，黨還須進一步的「主動努力」。……唯心的、唯物的，否定的、肯定的，黨內黨外，都可以說，而且要說就暢所欲言。參加會議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積極因素調動起來了，每個人都想在奔向社會主義社會的時代巨輪上增加一份動力。³

記者傳遞出的是這樣的景象——在由人民組成的社會主義大家庭裡，每一個群體都是一種力量，都可以自由充分地表達自己的訴求。而這，正

-
- 1 對應著五十年代前期連串政治運動，1956、57年的知識分子問題，其中重點要解決的是，承認一些「肅反鬥爭」過了火，傷了人；其次就是將歷次運動中被「清理出去」的知識分子重新安排工作。這兩部分涉及的人數比例不算高，但卻是物傷其類，影響最廣。
 - 2 在1957年公開刊行的「鳴放」文章或日後的口述回憶中，眾多親歷者都提到過《文匯報》予人印象深刻。呂氏的「北京消息」無疑是重頭戲。
 - 3 見《虛心學習/大膽批評——全國政協旁聽記》，載1957年3月21日上海《文匯報》，引文為摘錄。

是 1957 年最打動中國的突變性轉折。也是超乎民情與國情意料的轉折。

《文匯報》就這樣把它捅破了。

而在後者，關於毛主席對陳其通等四人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批評一事，《文匯報》記者姚芳藻寫到：「現在問題明確了，毛主席的報告，使大家的認識澄清了，眼光放亮了，陳其通等四位同志的文章，態度是粗率的，批評的方法是簡單的，只會阻礙『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貫徹」（摘錄）。這已是神州空前之「獨鳴」了。¹

上舉史實，都無可爭辯地顯示，在 1957 年 3 月的中國，《文匯報》關於毛澤東主席的一些獨一無二的報道，它對黨主席要衝破一潭死水局面的心領神會，是最高領袖在一些特定的場合褒揚該報的直接原因。

至此，在風雷激蕩的 3 月，《文匯報》風標獨樹，它原有的聲望，厚實的質素，令它重新復活之時，再放光彩。不僅保持了它在知識階級中已有的良好聲譽，更因它對毛澤東主席僅此一「報」、別開生面的獨家報道，在 57 年春季的中國政治生活中，攪起了一輪風暴。至此，「雙百方針」、「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知識分子問題」等等本來只具特殊含義的調整體制關係的話語，開始越出各自原來的範疇，成為整個社會的焦點，並被引入政治漩渦之中。

歷史就是這樣被「創造」！

從人格意義上說，徐鑄成時代的《文匯報》，是比任何報紙更像是「書生辦報」的新聞紙。以徐氏、浦熙修等人為首的知名新聞人，是以這樣的風骨為報紙鑄入魂魄：正義、民主；公平、善良。從歷史使命言，這是一張在現代中國代表了知識階級以及精英分子口味的報紙。一樣是歷史局中人的徐鑄成們或沒有意識到，《文匯報》此際發出的並非是「文匯人」的話語，而是一個正崛起的群體的聲音。它自身近十年的離奇遭遇，就反映了這種變化：1949 年 5 月底上海解放，在民國年間屢遭禁毀的《文匯報》隨後重又復刊，只是歡欣鼓舞的同人們沒有估計到，已被納入意識形態體制的《文匯報》開始喪失其傳統與優勢。進至五十年代

1 《進一步「放」/進一步「鳴」》，載 1957 年 3 月 21 日《文匯報》第 2 版。

前期，它已淪落為一張教育系統的行業報，到 1955 年已向《教師報》過渡，至 1956 年 5 月則徹底改稱為《教師報》。¹但誰也沒有想到僅旬月間，命運發生大轉折，《文匯報》奇跡般再獲重生。²從 1956 年夏它對外宣佈將恢復為原來的《文匯報》開始，到 9 月底，數月間它竟然收到了七萬封讀者來信，支持它恢復為原來的《文匯報》。³這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字。⁴十分明顯，這七萬封來信使它在復刊社論中底氣十足地宣稱，《文匯報》「是一張知識分子的報紙，必須從各方面滿足知識分子的要求」。⁵受壓有年的反彈是驚人的，「文匯人」將其一生最成熟的東西作了迸發。從 1956 年 10 月 1 日復刊起，在短短的幾個月中，《文匯報》如一股突然殺入的新生力量，對如雨後春筍般生長的中國形勢，一直在「催谷」。故此，《文匯報》在 1957 年春季由著命運闖入中國政壇，它的腳步已經不再為「文匯人」所左右，一如已納入軌道的運動體。它必然要將一個一直在浮浮沉沉的知識分子群體帶出水面。

在《文匯報》，它不過延續著中國傳統士夫階級幸遇「盛世明主」，永懷感銘之恩，傾力為王前驅的傳統，赤膽為「知識分子的春天」呼喚。而在毛澤東，他激賞這份報紙，從大處言，僅因為在他的政治藍圖中，該報打破了一時令他焦慮不已的困局。⁶只是形勢比人強。在這一前所未遇的轉型期，合著「放」的呼聲與潮流，知識分子這個身份與地位在新社會從未被清晰確定的群體，被驟然推上政治的前台。這裡面有多重含義：其一，在這個清一色以勞動階級為理念的社會，這一變化很礙眼；

1 參閱《文匯報》諸老報人的回憶，見《從風雨中走來——文匯報回憶錄》一書，上海：文匯出版社 1993 年版。

2 徐鑄成對此有詳細的回憶。

3 見 1956 年 10 月 1 日復刊之日《文匯報》社論《敬告讀者》，第 2 版。

4 從該時期的民風與社會道德看，這個數字的真實性應無可懷疑。

5 見前註復刊社論《敬告讀者》。

6 毛澤東常痛感不斷有這樣的困局，如六十年代前期，毛多次形容不執行指示的一些部委與北京市委，是「針插不入，水潑不進」。1965 年批《海瑞罷官》，便要通過上海打響第一槍。儘管徐鑄成追憶毛主席謂《文匯報》的琴棋書畫等辦得好，眾報中他總先看此報，但以毛所喜的口味，他其實並不真的喜歡這種傾向，只不過《文匯報》的風格，在已呈千人一面的眾報中，譬如突然吹來一陣清風。



生氣勃勃的上海《文匯報》，既擁戴了領袖，更將知識分子這一特別的群體推到了社會的前沿，佔盡了風潮。圖為1956年10月1日該報的復刊號。

其二、既然變為焦點，它使原有的各種社會關係、相互牽制的社會矛盾出現新變動與改良；其三，無論是否錯位，知識分子不由自主成為各種社會矛盾的代言體。這是超出絕大部分親歷者的意料之外的！

從1956年起至1957年2月，中國社會曾持續出現過多個熱點：「社會主義工商業改造」、「民族資本家改造」、「掀起社會主義建設新高潮」、「全國農業產品的統購統銷」、「執行知識分子政策」、「貫徹『雙百』方針」、「貫徹與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和平解放台灣」等等。而到了1957年3月份，上舉大部分的熱點漸次低落，惟有「知識分子問題」、「『雙百』方針」超越其他社會熱門現象，成為其時中國最大的兩個焦點。¹

1 又因「雙百方針」的落實，與知識分子緊密相連，故雖屬兩大焦點，實亦還是同一個大範疇，即「知識分子問題」。

三

最高領袖遠感不滿足的新國氣象，有一群人卻感受到了。這一群人以半生坎坷的經歷，感受著家國已開始步入一個春暖花開的時代。¹

一個新興的群體登場了。

這就是在整個五六十年代一直被人們呼之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群人。

從 1954 年起，隨著朝鮮戰爭的結束，國內清除舊政權殘餘勢力的鬥爭完成²，中國共產黨治國重點向發展國民經濟上轉移。這一轉移，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地位出現新的變化。經濟建設的現代化要求，與人才的匱乏，構成了五十年代中期中國社會最大的一個瓶頸。具體而言，「知識分子問題」隨著 1955 年更大範圍的一次「肅清反革命」運動而開始突顯。這場重點在國家機關、事業單位等體制內「純潔隊伍」的運動³，對知識分子的觸動最大，故而出現了一個從未有過的現象，幾年來基本以逆來順受態度適應新政權的這一群體，首次對運動產生「反彈」，牢騷之聲盈耳。⁴這其實是一個重大的信號。幾年來已「緩過氣來」的這一群人，開始對他們在實際生活中已顯出重要作用、但又仍舊處在被斥責的政治地位這種畸形的現實發出了不滿。⁵

1955 年是個變化之年還在於，從該年的下半年起，毛澤東催快了各行業「完成社會主義改造」的步伐。中國社會此時很像一個新舊雜陳、

1 這一時代從他們的父輩起就夢寐以求！1957 年 4 月，戲劇教育大家熊佛西在接受《文藝報》採訪時謂：「我從事戲劇教育事業三十一年了，現在才是一生中最愉快、最理想的時刻！」（見 1957 年 4 月 28 日《文藝報》第 3 頁）熊氏之語可為此時段定音。

2 社會的新生與陣痛，如一場久旱逢甘露的颱風，將人類幾千年改朝換代所無法避免的血腥與殘暴一捲而過，而新景象旁若無人升起，秩序就此重建。

3 當時有一語形象地稱為「再過一遍篩子」。見 1955 年廣東省委某領導人在一次佈置運動會議上的講話。

4 1955 年高校「肅反」，重點在查歷史，尤其查與「美蔣」關係的歷史。這與 52 年的思想改造運動有很大不同。思想改造還只是自查與表態，著眼點在提高認識。「肅反」則是政審與飯碗過關。民國年間大部分有成就的學者，都與「美蔣」有撇不清的關係，打擊面反而更廣。

5 這直接促使一年後藉著大鳴大放，眾多知識分子對「肅反」運動過火的做法提出批判。

剛開工的龐大工地，太單薄的底子，太缺乏的人手（人才），對應著太大的工程規劃，都凸現著對技術與知識的極大渴求。

在 1955 年下半年，「關於知識分子問題」這種特別的說法，已列入中共核心領導層要盡快解決的議事日程。¹ 11 月，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研究知識分子問題十人領導小組」（以下簡稱「十人領導小組」），籌備明年 1 月舉行的「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² 11 月 24 日，周恩來在中央有關會議上作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就因是日的重點在提出問題，以引起重視，故周恩來的講話多了些即興發揮，保留了許多其時最本真的信息。談到對中國知識分子的估計時，周氏有幾段話語很精彩：

中國知識分子不是多而是少，高級知識分子如此，一般知識分子也如此。

列寧在 1921 年曾說：「必須學會謙虛謹慎，學習切實的分析，克服自滿，少擺妄自尊大的架子……，共產黨員在國家計劃委員會內的任務便是少用命令主義……」（原按：此引語文意不全）。說明要求不能太急，同時應看到中國的知識分子比沙皇時代的俄國知識分子好得多，列寧對俄國舊知識分子尚那樣估計，中國應有充分的估計。

中心的問題是尊重他們。尊重他們的知識，還要向他們學習。尊重不是口頭的。³

1 從現今能夠看到的材料，周恩來在 11 月份的幾次會議上已能嫻熟地列舉全國知識分子狀況的一系列數據，從中可推斷對這一群體的全面調查當在更早的時候。

2 十人者為周恩來、彭真、陳毅、李維漢、徐冰、張際春、安子文、周揚、胡喬木、錢俊瑞。見《關於知識分子政策文件彙編》，黨內學習材料，1962 年製。另可參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上卷「1955 年 11 月 23 日」條，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521 頁。

3 周恩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講話》，1955 年 11 月 24 日，載前註《關於知識分子政策文件彙編》。周氏這篇講話固然有知識分子仍需長期改造的闡述，不過考慮到當時的風氣，筆者認為「長期改造」只是周的過場話，他最想表達的還是上引文字。

經過一個多月的緊張準備，1956年1月14日，中共召開了立國後首次「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大型會議，周恩來代表中央作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周氏報告中有日後為述史者津津樂道的數語：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必須依靠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兄弟聯盟」，而知識分子「他們中間的絕大部分……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也就是說知識分子第一次被正式認可，被納入工農陣線中，能跟在工農後面成為聯盟中的一員。如果聯繫從1952年鋪開的思想改造運動，到55年的「肅反運動」等一系列的風暴過程看，周恩來實際是對知識分子作了事後的最大安撫。僅僅相隔數月——全國「肅反運動」大致在55年秋季收尾，以周恩來為代表的部分中共領袖，就著意要讓「過去」成為歷史，知識分子應該馬上擁有未來。

事物的規律就在於，它是無法省略過程的。六、七年來一個地位尷尬的群體，即使人為地突然將它的政治身份拔高，它仍然需要一個積累的過程。

但畢竟「春江水暖鴨先知」，周恩來報告反映的是這樣的時流新聲，從這一群體眼下的實用價值看，知識分子的社會可用價值與貢獻，已開始超越「工人農民」之上，站在了現實的最前沿。毛澤東1957年3月巡視華東數省的多場演講，用粗放的口語道出了這樣的情勢：

同志們要知道，我們一步也離不開他們（按：指知識分子），離開他們沒有人教書，沒有人當工程師，沒有人研究科學。大學教授，中學、小學教員，大都是他們，文學家、藝術家大都也是他們，離不開他們。離開他們，我們一步也不能動，所以應該好好跟他們團結。¹

正因離不開，突顯著需要。又因需要顯出他們的稀缺、寶貴。據1956年中央批覆「爭取留學生回國工作組」一份報告反映，截止到1955年底，

1 見《在山東省級機關黨員幹部會上的報告》，1957年3月18日。

全國最高學術機構中國科學院，現有副研究員以上的科研人員只有 401 人，全國高校副教授以上的教師也只 7000 餘人，而其時滯留海外的留學人員即達七千。言下之意國內人才奇缺，滯留海外的人才資源若能利用足可頂半壁江山。¹又據「十人領導小組」的另一份報告統計出，至 1955 年底，全國共有高級知識分子約九萬七千人左右。²1956 年，中央首次就「高級知識分子」這一概念進行定義，周知全國各級黨政部門，該定義云：

高級知識分子的標準

大學畢業程度且有幾年工作經驗，能獨立工作的知識分子。例如：高等學校講師以上的教師，研究機關的助理研究員以上的研究人員；醫院的主治醫生以上的醫藥衛生人員（包括有同等程度能力地位的中醫）；經濟機關中副工程師以上的工程技術人員和有同等程度的其他人員；名作家，名演員，名藝人等。在名演員、名藝人中，即使一般文化水平不高，只要在文化藝術方面有特殊技能，或特殊貢獻者，亦應列入高級知識分子。³

五十年後重看這個標準，很能讓人興歎！⁴它反映出五十年代中國整體國力低下，受過良好教育者稀少。在此轉型時期，任是自豪的樸素階級感情者，也要面對這樣的現實：在建設現代化國家的過程中，有文化與知識的人，將要唱上主角。

1 《中央轉發爭取留學生回國工作組「關於爭取尚在資本主義國家留學學生回國問題的報告」的批示》，1956 年 2 月。

2 《關於全國高級知識分子人數的調查報告》，載 1956 年 1 月「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專題報告之一。

3 見 1956 年《統戰工作學習材料》（廣東）所載《關於高級知識分子的標準》一文。該件未署印發月份。另：該標準定義只是一個大框框，具體到各行業，不易照套用。故各省根據自己的情況，各自再作了一些補充規定，如廣東省在「教育方面」的補充規定，第一條有如下語：「過去曾任大學教授、副教授或講師，今為中學教師者，雖然教學方法上水平不高，但對某門科學理論修養有較高水平者，亦應列為高級知識分子。」

4 即如今日高等院校講師，恐怕連中級人才也未必輪得上，不惟待遇不可與教授同日而語，若以地位論，僅如初入行者。

而對於國家的執掌者而言，關於知識分子有本事的最直觀的感受，是能醫治戰爭帶給他們創傷的醫生與醫療科技，以及能使一個城市有生氣的「工程師」。¹新中國建國之始即全盤照搬蘇聯高級幹部的保健制度，令許多人深受其益。而各類「城市工程師」的努力，又使一座座因戰爭而變為「死城」的城市，重新煥發活力。在這裡，有一個很強的意象：「醫生」與「工程師」，都是直接創造美好生活的腦力勞動者，是典型的知識分子。²所以，毛澤東在1957年上半年關於知識分子的系列言論中，「醫生」與「工程師」是使用頻率較高的兩個詞。從這裡可推斷毛說知識分子是有些本事的背後原因。

1956年2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首次對這一已被擁上歷史大潮浪尖上的群體作政治性的定位：

我國社會主義的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的高潮的到來，日益顯出科學幹部、技術幹部和一般文化幹部的重要性，同時也日益顯出我國知識分子不論在數量上和質量上都遠遠地不足以適應國家的需要。因此，黨有必要進一步地把知識分子問題放在全黨和國家的各個工作部門的議事日程上，要求全面規劃，加強領導，克服我們在這方面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現有知識分子的力量……³

1949年後，具有最高權威的「中共中央指示」，等同法律。這個「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指示」，以權威的形式，嘗試界定知識分子這一階級其

-
- 1 指各種城市生活必不可缺的專業技術人才。1949年後的頭幾年，中國共產黨很喜歡用「入城」一詞形容當家作主建立政權。從另外的角度看，這詞其實更有開始認識「現代生活」的意味。故此，在1957年整風前夕，毛澤東痛恨「入城」後很多幹部沾染了惡劣的老爺作風。
 - 2 所以在五十年代前中期，「工程師」是備受推崇的一個知識符號，它幾乎是「學好文化，建設社會主義」的代名詞。當然，這主要是受了蘇聯的影響。
 - 3 引文為節錄。

地位出現新變化後應具有某種待遇的政治格局。¹ 只是所有階級地位的升降變易，必然會改變相應的社會關係、以及帶出新的現實訴求。在知識分子這一群體被定位為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到來，日益顯出知識與文化的重要時，原有的「社會矛盾關係」馬上突顯，上升為社會的焦點。

今天實事求是地說，1956、1957 年的大知識分子兼政客羅隆基²，在中國大部分的高級知識分子心目中有著不俗的印象，羅隆基以「局外者」的角度，體察出這種衝突的一些來由。羅隆基此時期的一些言論，說出了相當部分知識分子的心裡話。其中尤以 1957 年 3 月 18 日羅氏在「政協」大會上的發言最有代表性。

這是一篇同樣有著重大歷史標記的文獻。羅文全長四千字，本著還原「歷史現場」之旨，今按 3 月 19 日《文匯報》所刊報道，摘錄羅隆基發言的部分要點如下：³

羅隆基認為：今天的關鍵問題，仍然是怎樣消除黨與非黨的隔膜，使黨員領導幹部同黨外知識分子，精誠團結，融洽合作，這樣才能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量，為祖國建設社會主義社會服務。

羅隆基接著說，周恩來總理在一年前就指出，「隔膜常常是從兩方面來的」，同時又指示黨員幹部「必須主動地努力消除這種隔膜」。羅隆基以評級、擴大知識分子進修培養的機會等方面，對黨員幹部怎樣「主動努力」來消除隔膜提供了意見。一年來「百花齊放」，放者不多，「百家爭鳴」，鳴者太少。兩個口號提出來的時間太短，可能是原因之

1 權威如「中共中央指示」，一年後也不敵形勢的急轉，該指示 1958 年後實已失效。

2 說羅隆基是知識分子，羅求學時主修哲學兼政治學，投身社會後曾任多種報紙、雜誌的主編，並一度為西南聯大大學受聘教授。說他是政客，羅氏半生從政熱情不衰，政治是其終生職業。在動盪的政治舞台上，羅氏既有獨立之志，復多左右逢源之舉。

3 3 月 23 日《人民日報》才在政協委員發言專欄中刊出羅氏全文，此時期該報每天所刊政協委員發言稿均有多篇，羅文排版靠後，不顯眼。《文匯報》其時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已在《人民日報》之上，故推斷羅氏言論在 3 月 19 日已由《文匯報》廣為散播。

一。但根據反映的材料，基本原因還在一般高級知識分子顧慮太多，猜疑太重，以致花不敢放，家不敢鳴。這主要是某些黨員幹部和黨外少數進步人士，對「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兩個號召，缺乏正確的認識和體會，過急過早地對思想學術的「放」者「鳴」者，不惜口誅筆伐，「包抄」「圍剿」，這就使一般舊知識分子更加思想混亂，無所適從，更加退縮不前，而對領導幹部和一些進步人士就更加「畏而遠之」了！這種現象對國家思想學術的發展是大有妨礙的。

羅隆基認為，消除隔膜，舊知識分子在學習馬列主義理論外，還要學習中共黨史和中國革命史。這樣，我們才能明白老幹部經過怎樣困苦的革命鬥爭，受過了怎樣艱難的政治鍛煉。革命老幹部語言比較坦率，行為比較憨直，鬥爭比較猛烈。這是長期革命生活中養成的習慣。這是黨外知識分子必須了解認識的。領導幹部從軍事革命工作轉到文教領導工作的崗位上來，在掌握了馬列主義以外，也還應該讀讀「資治通鑑」這類中國的史籍。這樣就能熟悉中國社會的歷史背景和文化傳統，明瞭從中國士大夫階層中成長起來的高級知識分子的特性。名利觀念，「獨善其身」「明哲保身」這一大套構成士大夫立身處世的特點，也正是舊知識分子不幸而有的弱點。

羅隆基指出，在目前來說，應該把個人和黨的界線分別清楚。一方面，不可以把個人的偏差看成政策的偏差，更不可以把個人的錯誤看成黨的錯誤。另一方面，接受黨的領導，不完全同於接受黨員個人的領導，黨員個人的威望不等於黨的威望。批評個別黨員，不管批評是否妥當，不等於反黨，更不等於反革命。我們今後必須深切地體會毛主席關於「正確地處理人民內部矛盾」，關於「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這一切指示來處理問題。¹

羅隆基藉「黨與非黨的隔膜」、「如何相處共事」等現象說事，他

1 《消除黨與非黨的隔膜》，1957年3月19日《文匯報》第1版。引文為摘錄。

捅開了一層天窗：隨著知識分子地位的異軍突起，這一開始扮演著社會前進主動力的群體，已與體制形成了新的對立關係。他們潛意識要重拾與這種變化相適應的群體尊嚴，以及對現實的話語權。換言之，這一群體新興的地位，決定了它對現實有了新的訴求，與改變現狀的呼聲。說一句直白的話：「隔膜」與「相處共事」等語言，反映的是兩股力量應「對等」這樣的要求。

這是決定 1957 年中國命運的最根本內因！

這是一篇已經預示著未來的關鍵之文。羅隆基指出的種種隔膜、不公平、知識分子被整怕等等，已經「規範」了四十多天後全國絕大部分高級知識分子鳴放的調子。也就是「吐苦水」的內容，基本無出羅文的範疇。最可注意的是這樣一點：羅氏 3 月 18 日的獨家之言——「不可以把個人的錯誤看成黨的錯誤」；「批評個別黨員，不管批評是否妥當，不等於反黨，更不等於反革命」，數月後完全相反過來，成為無數「右派」的罪證！

羅氏發言是否另有心機今已難論，但說羅氏之言實為其時中國數百萬知識分子的心聲，當大致不差。若說此一刻羅隆基以「處士橫議」之姿在廟堂之上代潮流言，¹則現實社會早就出現了世風已變的紛紜世相。

最快感應 1956 年暖春的，是社會生活直接的反映——文學藝術與新聞出版。1956 年，是共和國立國後文化形態最為自由活躍的一年。在 1 月「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開過後，2 月起，北京文壇就展開了對「文學藝術中的典型問題」的討論。3 至 4 月間，全國有多個聲勢很大的文藝活動舉行。5 月，先有轟動一時的崑劇《十五貫》在京華展演，中共中央多位領袖前往觀看；就是該劇，將延安時期就已提出的「推陳出新」作了生動的演示。5 月 26 日，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秉承毛澤東之旨，在中南海懷仁堂向文藝和科學界作報告，提出了震撼性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學術研究方針。此後，它直接帶動了影響甚大的一連串全國性的文化爭鳴與學術討論——「關於美學問題的討論」；「關於音樂的『民

1 羅氏時任國務院森林工業部部長，不過，無論從哪方面看，羅氏從未能成為公家眼中的「自家人」。羅氏一向的言論，「在野」之跡甚濃。

族形式』問題的討論」；「關於如何豐富傳統戲曲上演劇目」；以及雜文、小品文、相聲等諷刺文藝，在社會主義時期有何特點等等的討論。此外，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同樣先後有兩場「爭鳴」引來各自領域的關注，一是1956年8月中國科學院和高教部聯合在青島召開的遺傳學座談會；一是1957年1月由北京大學哲學系召開的中國哲學史座談會。……這些爭鳴，部分持續至1957年上半年，個別餘波甚至延及六十年代前期。

回到敘述中的1956年下半年，在6月底至7月，中國戲劇家協會主辦「《琵琶記》討論會」。10月1日，上海《文匯報》在萬眾期待中復刊。這是1956年文化中國最有代表意義的一件事，它出現在該年的最後一季，不僅將神奇的1956年推向了一個完美的收局，而且它從某種意義上說誘發了1957年的新局。它以沉鬱良久的儲蓄力，為一股新興的力量全力鼓與呼，它更以自由、公義的率性投身現實批判。11月，醞釀多時的「為甚麼好的國產片這麼少」的討論，首先由《文匯報》發起，它在四五十天時間裡，將陣容相當可觀的一流作家與電影家都牽入其中。它甚至牽住了全中國文藝界的眼睛，因為爭鳴已涉及到體制干涉藝術創作等敏感問題。12月21日，《文匯報》登出闖下大禍的《電影的鑼鼓》一文，¹兩個多月後，毛澤東公開點名批判《電影的鑼鼓》，便可知他對《文匯報》關於「國產片」討論的全過程，清楚得巨細無遺。《電影的鑼鼓》出現在1956年的歲尾，很有象徵意義，它既是1956年「活躍的中國」的總結，它同時又象徵這個國家帶著「放」與「亂」的世態進入新的一年。在「強權」已成為二十世紀中葉掌控世界命運的國際主流下，²在中國，「時運、國運、人民」都呈現為一條奔騰不已、沙泥俱下的大河……

此外，貫穿整個1956年，一直刺激方方面面神經的，是一些揭露

1 作者是鍾惦棠，該文首刊1956年第23期《文藝報》，鑒於該報的影響力比不上《文匯報》，筆者相信該文經《文匯報》納入討論範圍刊發，其「政治意義」立馬有變。

2 世界幾大洲幾乎同時湧現代表不同利益的強勢領袖人物，使「二戰」後的世界進程幾變為巨人間角逐的歷史。

官僚主義黑暗面的文學作品陸續問世，並引起很大的爭議。其爭議已越出文藝界的範圍，被看作是一種政治動向，被粗暴地上升到政治層面，開始激起體制內相當部分人的反感。¹

相比於「春潮晚來，然春光更豔」的1957年，以上對1956年的概述，掛一漏萬，即使如此，仍可見所謂「亂哄哄」（反對者語）的時潮特徵。五十年來對1956年這一種「亂」，無論官方意識或私家研究，俱簡單歸結為意識形態政策「放」或「收」的後果，故數十年來這種「放或收」的故事竟然反反覆覆在每一個變化時期上演。實際上1956年文化學術界的「亂」，最深刻的緣故，仍是知識分子這一群體在歷史地位發生變化時一種政治要求的結果。在56年5月26日關於「雙百方針」的報告中，陸定一談到如何創作時這樣說道：

題材問題，黨從未加以限制。只許寫工農兵題材，只許寫新社會，只許寫新人物等等，這種限制是不對的。（中略）在文藝作品裡出現的，不但可以有世界上存在著的和歷史上存在過的東西，也可以有天上的仙人、會說話的禽獸等等世界上所沒有的東西。文藝作品可以寫正面人物和新社會，也可以寫反面人物和舊社會，而且，沒有舊社會就難以襯托出新社會，沒有反面人物也難以襯托正面人物。²

陸定一說的似乎僅是專業性很強的藝術創作，但聯繫到自從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成為革命文藝唯一方向以來，尤其在1954年批判「胡風文藝思想」後對寫工農兵與寫新社會的格外強調，即使陸定一本人均未必意識到，他在5月26日講話中關於題材不會受限制的說明，實際正是一種新的社會關係發生變化而在文學藝術上的反映。對知識分子，無論從精神上還是在地位上，時世開始表現出一種謙恭。

1 矛盾的地方就在這裡，此時毛澤東並不認同黨內反對的聲音，在1957年頭幾個月幾乎逢提「鳴放」時，必舉一些批判現實的作品作例子，以表他不怕放出香花或毒草的態度。

2 摘自《六十年文藝大事記》一書（第四次「文代會」會議讀物），第163頁，第四次文代會籌備組起草組、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理論政策研究室編，1979年10月。

第一章 中國學人的縮影

有一個人，他不一定是 1956、1957 年之際知識分子最典型的代表，但他在很短的時間內遭遇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始以尾巴翹到半空，旋被打落在地，復又當作毒草鋤掉這樣劇烈的起落，最後又以漫長的屈辱偷生為代價，原原本本書寫了「右派分子」這一名詞從誕生到終結的全過程；而且他尚以人格、信念最後將所有的痛苦轉化為不息的文化精魂，標識著這一事件在五十年後的今天，有可能從文化史上作另一番的解讀。

他就是時任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的董每戡，一個在當時戲劇界已有相當名聲的學者。

另外，這位被時人敬稱為「老專家」的大學教授，他的另一政治身份是民盟廣東省委委員、民盟中山大學副主任委員，這樣，在 1957 年夏季最易被人痛恨的兩種人——「民盟」與教授，董每戡兼而有之。這樣的身份，使這位一生都具獨立思考與批判精神的學者，在 57 年由著本性，步步走入羅網。這種「身不由己」，使很多人終身留下遺恨。在今天回顧 1957 年的過程中，歷史一直無聲地進行著一種揀選，揀選著人，也揀選著故事。

—

和大多數逃過五十年代重重關隘的士人一樣，對於董每戡來說，1956 年是心情無限暢快的一年。

該年1月，北京召開了「關於知識分子問題會議」。1月30日，《人民日報》全文刊發了周恩來近三萬字的報告。2月初，會議的內容在全國科學、教育、文化、衛生等領域迅速傳達。與此同時，《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報紙連日以整版的篇幅刊發眾多社會賢達閱讀總理報告的體會。如前所述，在五六十年代多次重大事件發生的關頭，毛澤東都表達過對《人民日報》反應遲鈍的不滿，但在1956年2月，《人民日報》將其「喉舌之首」的作用表現得很充分。知名人士的發言，話語獨特，感情真摯；報紙編排氣勢逼人，極盡渲染，一掃長年「黨八股」的面目。一夜東風，驟放花千樹。隨後全國報紙聞風而變，大大小小的名人跟風暢談。在很短的二三十日之間，一個尊重知識、尊重文化的聲勢，就這樣在遼闊的九州初現蓬勃之勢。

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現象。一年後中共由整風運動急轉入帶有揭批性質的「大鳴大放」，《人民日報》在此前毛澤東不斷的責問聲中再次扮演了一年前提攪風雲的造勢角色。撇開這兩件事性質並不相同不談，單就運動的宣傳模式、轉移風氣的效果而言，兩者實出一轍。這裡面就包含了多少五十年代中期中國社會的群體心理、思潮風習等等的信息，很值得深究。故此，今日對1957年的中國的認識，遠未窮盡。單就知識分子在此年的積極鳴放而言，從心理定勢推論，絕大多數人的鳴放，不過是沿襲著1956年以來自以為當家作主的心理慣性。

董每戡自然是這支由衷唱著頌歌隊伍中的一分子。比起許多經歷單純的學人，這位時年49歲的教授，更有資格在這個春天歌唱。

1907年舊曆五月二十日，¹董每戡出生在溫州一個「破落地主」的家庭。²董氏八歲喪父，少年失怙，董身為兄長，孝母至純。董氏一生善良，在親友中素有口碑，其源蓋可溯至少年時的經歷。1925年前後，董每戡

1 董每戡一直以舊曆計算生辰，故從之。

2 此據董辛名1968年9月28日所寫《我的自傳》一文（未刊稿）。董辛名為董每戡之弟，該文由董氏家族後人提供。



1956 年的董每戡

加入中國共產黨。¹ 1926 年，董每戡就讀上海大學，時該大學的管理權已為中共掌握，實際是中共培訓自己幹部的學校。1927 年，二十歲的董每戡被委任為北伐軍第 16 軍政治部宣傳科科長，² 後很快又被派到溫州從事暴動等地下工作。1927 年 11 月，中共浙江省委發生了連串大事，省委代理書記王家謨與省委特派員周定、鄭敬衡，到溫州策動「浙東暴動計劃」，剛抵溫即被國民黨偵捕。其中鄭敬衡被捉令人歎息，鄭氏右腳跛足，人未到步，溫州憲警已周知其特徵。鄭從水路抵溫，甫下輪船即為軍警認出拿下。³ 王家謨等三人到溫州，意欲聯繫當地組織，董每

-
- 1 董氏經歷複雜，早年參加中共復又與組織失去聯繫，1949 年後這並不是一個值得炫耀的歷史，故他何年入黨，有關檔案記載互有不同。據 1934 年第 40 期《十日談》雜誌所刊《記董每戡》一文暗示，董在十七歲那年就加入了共產黨。
 - 2 以上史實據「董每戡材料」，1957 年製，中山大學有關部門藏。
 - 3 參閱林運表、劉海冰：《周定、鄭敬衡等三位烈士被捕的時間、地點和犧牲時間的考證》，載 1983 年第 3 期《文成黨史資料》，第 30 頁。

戡是指定聯繫人之一。¹鄭敬衡剛落碼頭即被抓的消息震動市面，正等接頭的董每戡等人聞訊立刻星散逃亡。王氏三人被捉，軍警截獲一批文件與名單，牽涉面很廣，造成了又一場「白色恐怖」。1928年1月8日，上海《申報》登出關於「王家謨案」的後續新聞——《浙省又通緝大批共黨》，在列舉的「逆黨」名單中，其中有「《溫屬共產黨人通訊錄》董丐丐（溫州木灼巷二號曾宅）」一條。董丐丐即董每戡的曾用名。²據後來的種種跡象，董事發後躲避山中約半年。

這事件改變了青年董每戡的前路。其一，至今未發現董每戡重新加入共產黨的記錄，也即董每戡從此脫黨了。³其二，在很長的時間裡，董每戡一直背著「被通緝」的包袱，故其一生對國民黨絕無好感。其三，政治上的挫折，轉而誘發了董每戡的藝術天賦，以後因著憂時傷世，與追求自由的現代意識，董從此正式從事文化事業。進步思潮在動盪的二十世紀上半葉，是怎樣成為「激情新一代」眼中的人生希望，青年董每戡以及一批經歷相似的左派青年文化人的足跡，為這種歷史走向作了一個很好的說明。

這樣就引出了民國年間在上海的一個特有現象：一群群不滿現實的熱血青年，在受到西方人文主義或激進思潮的影響下，按照各自理解的「創造新生活」的理想，在這個華洋混雜的十里洋場，在文化、思想等領域一展抱負，意欲「喚醒沉睡的中國」。民國以來「國共」兩黨棋逢對手之爭，最持久激烈的戰場，其實一直就在上海。

據同在「王家謨案」中遭通緝的溫州地下黨員林亦龍晚年回憶，王氏三人被捉後，董、林逃亡，以後各自轉移到上海，1928年8月同時出亡日本。⁴

1 此據林亦龍氏1985年11月8日致董每戡夫人胡蒂子函。林亦龍，二十年代為溫州中共黨員，親歷該事件。

2 見1928年1月8日《申報》第9版。該史料承蒙溫州老劇人陳壽楠先生檢出並提供。

3 民國年間大部分脫黨者的隨後經歷，在1949年後都未被要求說得很清。董每戡在民國年間的一些履歷至今仍有待發見。許多年後，一些與董共過事的人回憶，董三十年代在上海為黨工作，有貢獻。此說似乎董後來又重返黨內。考董氏中晚年時的言行出處，董在上海為黨工作或有之，但應沒有重新加入中共。

4 見林亦龍1980年4月2日致董苗函（未刊書函）。董苗是董每戡之獨子。

二十世紀前期的東瀛，是一個讓中國知識分子愛恨交加的強鄰。這裡有開放的思想與文化陣地，西方各種外來新說似乎更樂意先從這裡靠岸，先由日人咀嚼一遍，然後以更猛的威力登陸大陸。中國青年在這裡固然無不感受到「蕞爾小國」對東亞病夫的鄙視，但同樣可獲得更為自由的思想武裝。而對於眾多在戰火頻仍的故國浴血拚殺的知識青年來說，這個一衣帶水、自宋元以來便開中土志士東渡避禍之例的島國，倒是世外桃源。時赴日留學「手續簡便，不論護照有無，文憑有無，都可以去」¹。最有吸引力的是，二三十年代日本深受西方經濟危機的衝擊，日幣幣值很低，「大洋一元，可換日幣一元八角」²，中國留學生在日生活所費可云低廉，甚至有人回憶，「一個月寫兩三篇短文章在國內發表，就可以夠在東京生活了」³。

青年董每戡在日本的經歷今已難細案，從其時他寫下的一些作品分析，他第一次到日本，開啟了他一生的戲劇之旅。1929年春，由孟超、董每戡掛名組織的新文化團體引擎社在上海成立。5月15日，由孟、董二人編輯的《引擎》雜誌創刊，內載馮雪峰、巴克、孟超等人激進的文論與作品，董每戡則發表獨幕童話劇《給我們需要的》。《引擎》鋒芒太銳，僅出一期，即遭國民政府取締。⁴同年10月16日，董每戡在上海《民國日報·戲劇週報》上發表《關於兒童劇》一文。⁵作品刊發在國內，而人卻在日本。從董氏幾年後所寫的一些文章可看出，1928年與29年之間，董每戡與沈西苓、許幸之等一幫搞藝術的友人在日本組織過劇團，排演過一些戲。青年董每戡重走了一遍他的前輩師友田漢等前驅者所走過的路，在這個島國沐浴著「八面來風」，用戲劇將人生苦悶與藝術激情發泄至盡。

1 蔡北華：《回憶東京左聯活動》，載《左聯回憶錄》下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版，第697頁。按：「不論護照有無」一句，所言及的情況或不是常態，但手續簡便則是事實。

2 林煥平：《從上海到東京》，載前引《左聯回憶錄》下冊，第682頁。

3 見前引書，第694頁。

4 倪墨炎：《三十年代反動派壓迫新文學的史料》輯錄（續一），載1988年第3期《新文學史料》。

5 見《上海革命文化大事記（1919—1937）》一書，中共上海市委黨史資料徵集委員會等編，上海書店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頁。

1929年底，留日一年有多的董每戡重返上海。時先期歸國的沈西苓、許幸之等人與國內友人正籌建藝術劇社，據董每戡回憶，他剛歸國時碰上藝術劇社首次亮相，他即被指派為舞台「提示」（按：約等於當今之「劇務」）。1930年1月3日至5日，藝術劇社在上海寧波同鄉會禮堂首演成功，影響很大，為其時城中文藝圈一大盛事。¹2月，董每戡赴濟南，應聘為山東省立高級中學語文教員。此時，比董大四歲的進步作家胡也頻也在該校任教，胡、董等人給這間剛改制不久的名校帶來的是漸見騷動的激進思想。結果在該年夏，兩人已無法再立足學校，胡也頻與董每戡只好狼狽撤離濟南，董每戡又回到上海。

1930年的上海，新文學運動進入新的革命熱潮期。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成立，隨後一批激進的書籍與刊物相繼問世，上海灘上演著「開張——查封——再開張」此起彼伏的生死鬥爭。在戲劇方面，激進的吼聲同樣刺激著殖民地的夜空，各種新式劇社爭相排演國外名劇，在抒發個性解放上，戲劇是以更激昂的形式，宣揚著新文化運動的精神。同年8月，中國左翼劇團聯盟成立。1931年2月，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成立。青年董每戡就這樣在上海開始了他的左聯生涯，參加了上海進步戲劇的活動。董以一後進追隨田漢，與一批「左聯」劇人結下生死情誼。從現在能找到的部分資料可知，董每戡此時期寫下了不少供排演的劇本以及文化時評，在滬上已是露出頭角的文學新銳。據五十年後已是文壇老成的劇作家杜宣回憶，1931年他考入中國公學高中部，1932年1月，中國公學在該校教授董每戡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隸屬「左翼戲劇家聯盟」的中公劇社，隨後中公劇社首演了兩個獨幕劇：一個是董每戡創作的《飢餓線》，一個是田漢所寫的《姊姊》。²這是一段含有不少重要歷史信息的回憶。1957年7月後，董每戡成為臭名昭著的「右派」，他在左聯的業績遭積極分子質疑，謂「在革命戲劇史裡找不到此人的名字」。實際二十世紀前期的左翼文藝大佬們都出生於十九世紀末，

1 參閱上引書，第247、248頁。

2 見陳方《一片愚誠唱赤旌——劇作家杜宣的創作生涯》文，載《中國話劇藝術家傳》第4輯，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87年版。

至三十年代基本已功成名就，以後在四五十年代的革命文藝史述中，大佬們的生平就等於一部主流的歷史。然在那段血與火的歲月裡，有眾多激情的人與眾多熱血噴湧的文字，雖曇花一現卻總是前赴後繼，才潑灑了一幅鮮血淋漓的「左翼文藝」的長卷，成百上千無名熱血青年獻出的青春與才華，奠定了畫卷的厚重。

1932 年底，二十五歲的董每戡終於成名。該年 11 月，他應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新成立的美專劇團所請，用三個晚上的時間趕寫出一個三幕劇《C 夫人肖像》。這是美專劇團成立後上演的第一齣戲，¹ 人與戲一炮而紅。在劇團，主演者為美專學生趙丹，該劇是他嶄露頭角的第一部戲；在作者，該戲描寫了幾個抱不同藝術觀的藝術家，經幾番思想衝突，最後走出象牙塔，投身現實鬥爭的故事。其時滬上藝術圈，為藝術而藝術之風甚盛，這齣本質上仍見西洋浪漫諦克劇作風格，然已具為革命理想獻身傾向的舞台劇，令人耳目一新，隨即走紅。²

《C 夫人肖像》的成功，烙下了三十年代前期上海的蒼茫與上海青年的淒迷，劇作者的才華與世界觀也融於一爐：劇中畫家張小石氣質浪漫，正直善良，在山河破碎的關頭毅然告別往昔的生活而融入抗爭的洪流，不見偏激，而呈獨立思考，它糅合了作者的影子。在左聯的幾年中，文學青年董每戡還在上海《申報》等報刊上發表過許多篇稿子，是左翼陣營中的一分子，行文優美，筆調憂鬱，已見出在革命隊伍中這位一直保持個性者的另類。

1933 年底或 1934 年初，憂鬱的董每戡第二次東渡日本。至今尚不知這位聲名已呈上升勢頭的青年因何離滬赴日，³ 他在初抵東瀛向上海雜誌發回來的一篇哀悼德國文豪華塞曼之死的文章，或能透露內中消息：

自希特拉內閣組成以來的德國，所謂國粹主義運動的空氣已瀰漫德

1 見《上海電影志》第九篇「徐韜」條，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1999 年版。徐韜生於 1910 年，為其時美專劇團團長。

2 據董每戡 1933 年所寫《〈C 夫人肖像〉再版自序》謂，短期內戲連經幾個劇團上演，成績都還很可以，劇本初版千冊幾次公演時發售，而至於售罄。

3 就在 1933 年的 10 月，他仍與友人在上海新創建了一個文學團體。

國的全土，因之焚書坑儒的時期也復活，近代德國文豪猶太人華塞曼氏就是被他曾給以文學之榮譽的德國所驅逐的人中之一。在這一個文人的生命毫無保障的時代，文人喪失生命的方式雖各各不同，但致死之原因或無二致。（他）比起那些年青的中國左翼作家被奪去了生命，且至於死後連骸骨都不見的當然適意得多。華塞曼總算已逝去，那些和他同樣被放逐及將被放逐的人們，至少對於華塞曼這樣淒寂的死，會感到難過罷。¹

文筆傷痛中帶著激憤。時黃浦江邊逮捕、暗殺正烈，鮮血噴灑街頭，染紅了黃浦江。

董氏第二次到日本顯然逗留了很長一段時間，日後董每戡在填寫個人學術簡歷時，有「日本大學研究院研究」一項，估計這一經歷來自此時期。

193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1938年，董每戡投身實為共產黨控制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在這裡，他與一群多年的志同道合者重逢，患難之交續寫新章。在這段鐵馬金戈的歲月裡，他的戲劇才華，得到了充分的鍛鍊與發揮。38年初，他已寫出在抗戰劇壇大有影響的話劇《敵》、《最後的吼聲》，首交長沙「一致劇社」公演。38年4月，第三廳在武漢成立，董赴漢，在田漢直接領導下工作。董每戡站在了抗戰戲劇的第一線，寬闊的視野，深厚的理論素養，從未離開過戲劇現場的經歷，²使他在抗戰前期就為中國抗戰戲劇貢獻了多篇歷史綜述與理論反思的寶貴文章。隨著1938年敵焰橫捲大半個中國，曾聚在一起的同道也各奔東西。38年底，董每戡接受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政治部邀請，主持該部所屬神鷹劇團。

從1939年至1942年，董每戡與神鷹劇團轉戰四川、貴州等地，三、四年間，董每戡為該團編寫了多部很具戰鬥氣息的空軍戲劇，其中就有先後被西南各省乃至浙東等地劇社搬演的名劇《保衛領空》。抗戰前期，中國陸軍基本節節敗退，惟有空軍尚有可與敵寇一決高下的事跡流傳，

1 《悼華塞曼》，載1934年第10期上海《文化列車》雜誌。引文為摘錄。

2 董每戡以親身經歷，一直堅持中國抗日戲劇應從1931年「九一八事變」算起，因為其時上海劇人已用「街頭劇」、「活報劇」抒發國難家仇。

董每戡的空軍戲劇，是這段非常時期極為可貴的一種歷史與藝術的實錄。

在這幾年，董每戡為抗戰戲劇出盡了力。在建設神鷹劇團的同時，他還主持一些報刊的「戲劇專欄」，並主編被劇壇稱之為與《戲劇春秋》（田漢主編）、《戲劇崗位》（熊佛西、徐昌霖主編）三足鼎立的《戲劇戰線》雜誌。從資歷而言，三十年代初已致力於「左聯」戲劇事業，抗戰後又積極以戲劇為武器，投身神聖的鬥爭並卓有成就，董每戡的經歷，在全國戲劇界範圍內看，已可躋身前驅之列。

在抗戰的這段歲月裡，董每戡的戲劇觀、戲劇的藝術操練、戲劇的領悟力已經成熟，他完成了第一境界的「戲劇資本」的積累。

1943年9月，應好友東北大學中文系主任陸侃如所召，三十六歲的董每戡受聘為該校中文系教授。東北大學自「九一八事變」後遷離瀋陽，先後流寓多地，1938年後安頓在四川三台，1943年時學校中文系已不乏名家，有陸侃如、馮沅君等人。1945年作家姚雪垠也受聘中文系。很巧，陸、董、姚三人，十四年後俱被打成右派分子。在「東大」三年的經歷很重要，它決定了董每戡的後半生。在這段難得清靜的日子裡，董每戡完成了多篇有關戲曲起源、發展形制等方面的考釋論文，日後董每戡矢志不移撰寫「中國戲劇發展史」，從四十年代的這批論文看，可知董氏關於中國戲曲史的架構，在四十年代前期已經成型。在近現代，自王國維之後，中國戲曲的研究要落後於中國詩文的研究。直到四十年代初，以新舊方法兼容研治戲曲歷史的有成績者，除卻已逝者，不過二三人，如馮沅君、孫楷第、周贻白。董每戡的這些論文表明，此時他已躋身於戲曲研究拓荒者的行列。董氏文史知識博洽，文筆流麗，喜融匯個人的戲曲體驗，這使他的研究路數別具一格。由從事前衛的西方戲劇轉而潛入中國戲曲博大精深的傳統，了無生硬澀滯之跡，卻有得心應手之自如，董每戡都可算是現代劇人的一個傳奇。

三台的經歷，猶證明了董每戡還是一個出色的授業者。時學校也新聘多位名師，為「東大」各系注入了生機。此時校中的學生活動很活躍，讀書、演戲、評論時局，「國共」兩派學生互鬥，盡見風雲之色。¹作

1 本段史實參閱了唐宏毅主編的《東北大學在三台》一書，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

為一個有個人魅力的為師者，董每戡師長的儀刑就是在東北大學確立的。從幾十年後一些「東大」學生的回憶可知，遠未到不惑之年的老師，已然有名師風範。董每戡主授「戲曲研究」與「宋詞」等專業課，很受歡迎，尤以「詞論」為甚。據說董氏論詞，喜舉自填之詞為例，每多生發，觀者如堵。又比如董氏指導學校劇團排演《日出》一劇，轟動三台，其中戲裡妓女一角，找不到人演，董就讓夫人胡蒂子出演，胡演技甚佳，這在保守的川北，算得上是驚世駭俗之舉。

1945年1月，全國抗敵文協三台分會成立（後改名為川北文協分會），姚雪垠、董每戡負其責。同年，董每戡加入中國民主同盟。董開始被列入當局的黑名單。

1946年，「東大」校內鬥爭更趨激烈。5月，校方藉學校要復員之機，解聘了有左派色彩的趙紀彬、董每戡、葉丁易、楊榮國四教授。

董每戡離開東北大學後到了南京，應聘為金陵女子文理學院教授。1947年6月，董氏捲入南京學界「反飢餓運動」，再一次被學校解聘，他隨即前往上海。

此時「國統區」已到了大崩潰的前夕。在上海，為謀生董每戡先後兼任過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授（校址在蘇州）、商務印書館編審、大夏大學教授、上海國立戲劇專科學校教師等職。¹任是為稻粱謀，學術的精神仍散發著智慧之光，幾位受益於此時的學生，以後終身念叨老師的影響。董每戡與共產黨靠得更近了，他積極參加了民盟在上海解放前後的一些重要活動。

1950年2月，湖南大學中文系主任譚丕模向董發出任教聘請。²5月，董每戡前往其妻的老家長沙，受聘為湖南大學中文系教授。³其時湖南大學已是中南地區一所與眾不同的大學。毛澤東多位青年時代的師友在校中或任事或從教，校中知名的左派教授有李達、楊榮國、譚丕模等人，

1 以上史實見1979年10月董每戡所填《教授、副教授業務情況登記表》，中山大學有關部門藏。

2 見張谷、譚得伶主編《文學史家譚丕模評傳·譚丕模年表》，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7頁。

3 見湖南大學《新聘教員情況登記》，湖南大學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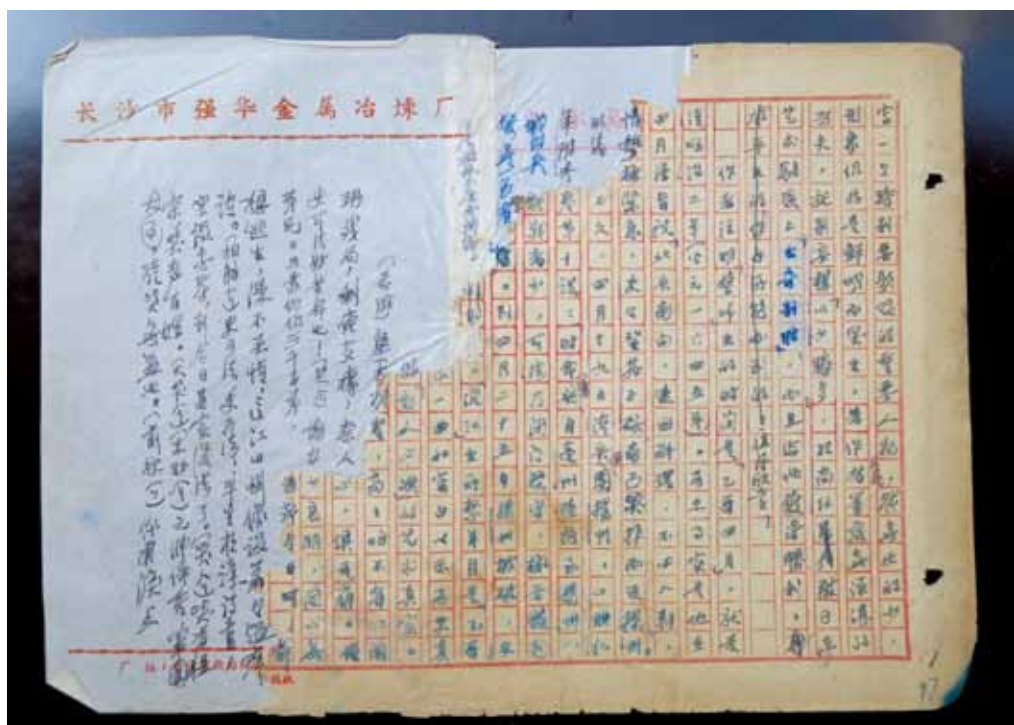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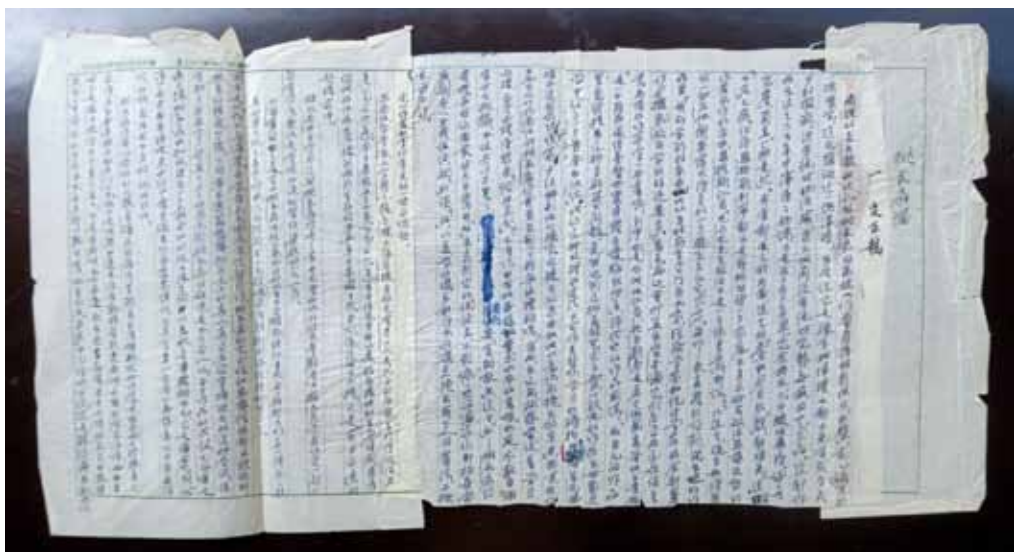
五十年代初出版的部分董著書影

一時虎嘯龍吟，也是近現代湖湘文化一段值得追尋的特殊歷史。董每戡在湖大、乃至長沙受到了禮遇。據湖南大學五十年代初的記錄，董每戡每月的薪金在絕大部分教授中（個別耆老除外）領最高一級——等值大米 1072 斤，與文教院長相同。¹在長沙，董每戡參加了湖南民盟、湖南戲劇改革等工作，與湖南省上層民主人士建立了不薄的交誼。1952 年底，全國高等學校「院系調整」，湖南大學變為以理工科為主的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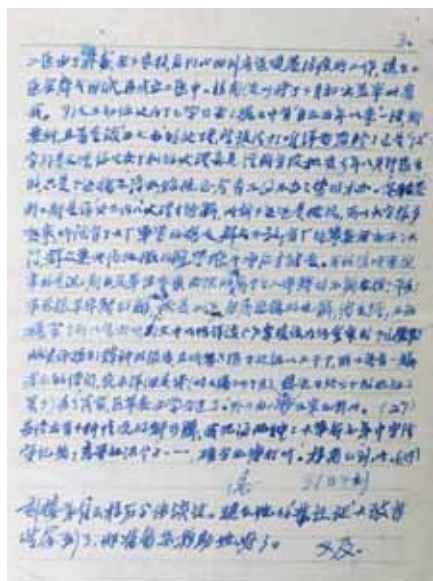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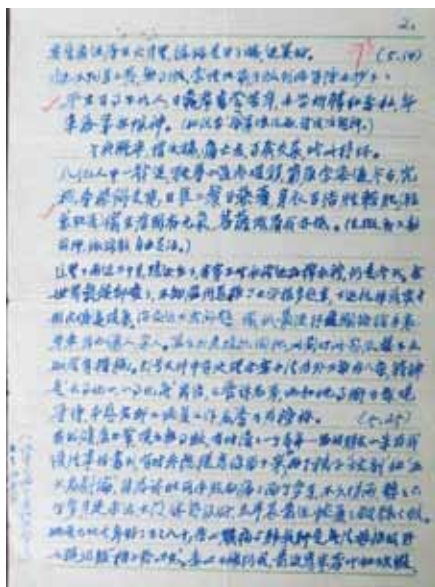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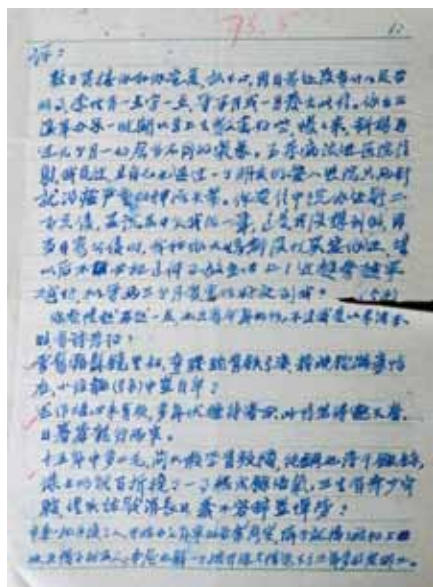
1953 年夏，董每戡被安排調入中山大學中文系。

從 1948 年至 1951 年，董每戡先後出版了《西洋詩歌簡史》、《西洋戲劇簡史》、《中國戲劇簡史》、《戲劇的欣賞和創作》等著作，這說明四十出頭的董每戡已開始由一個「多棲型」的文化工作者向一個純粹的治學者轉型。1953 年調入中山大學，則標誌著這種轉型已經完成。這幾本著述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1956 年全國高等學校教職工評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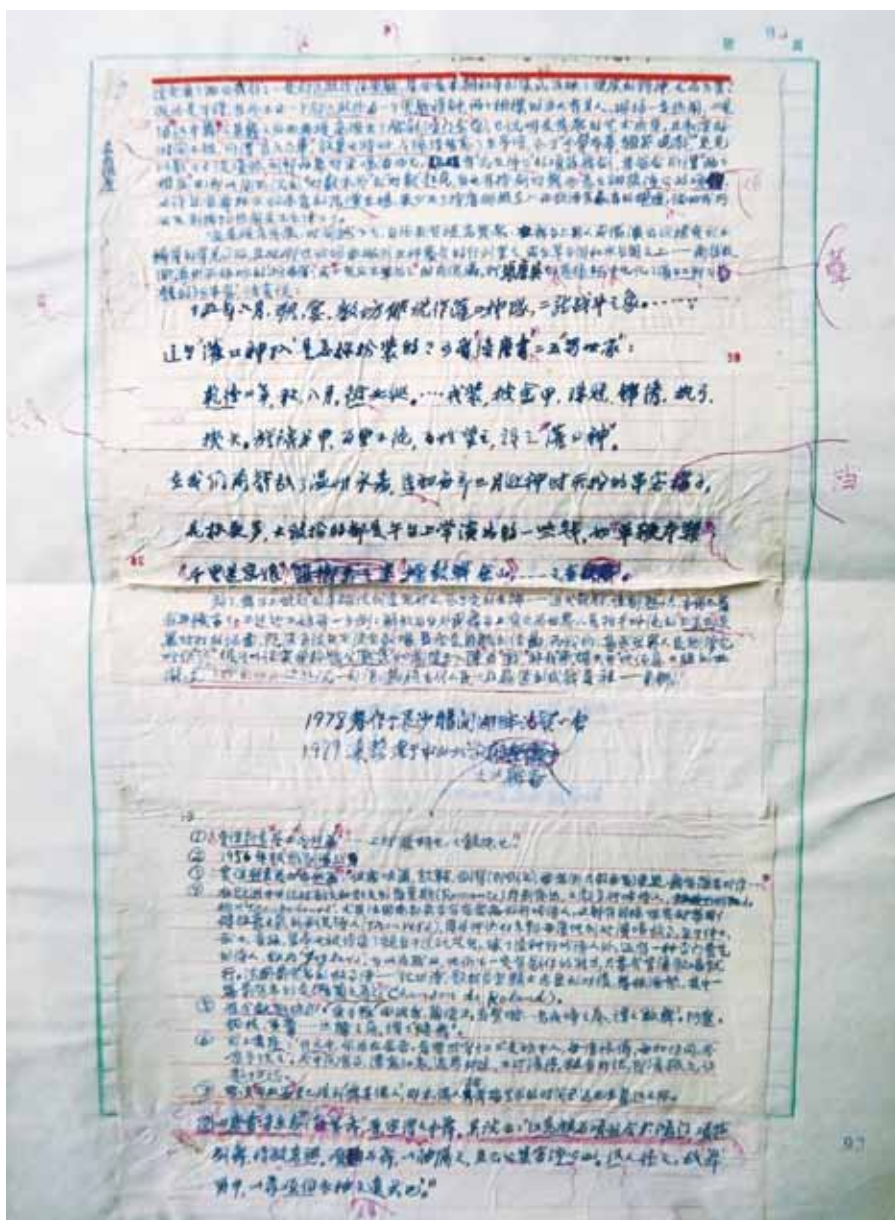
1 見湖南大學 1950 年《教職員登記表》，湖南大學檔案。1949 年前後，社會動盪，貨幣之值旬日數變，為保薪值，全國各行業盛行以發薪金之日，按等值大米計算的計薪方法。此法延至五十年代前期。



董每戡《桃花扇論》手稿



晚年已失去研治條件的一代學者，只能將滿腔的書寫激情，傾灑在寄與親朋好友的信札上，反而意外為特定時期的中國社會，錄下了另類的真實形態。董每戡特別的寫信方式——同一封信分多日添寫，好比一次有始有終的現實刻錄，即時、鮮活，狀之栩栩如生。這是一封從5月4日寫起，至5月31日才寫畢的信（局部）。



董每戡最後時刻寫下的幾篇論文，通篇人性與趣味性相融，留下了人生的暖意，折射出一個優秀學者在生命行將結束之時，他的心靈已達化境。圖為《說武戲》一文的手跡。



董每戡經歷過「左聯」，經歷過抗戰，實為其時文藝戰士的先鋒。三四十年後，第一代現代戲劇開山者凋零殆盡，董氏儕輩也垂垂老矣。熬過人生最後一場劫難後，他們也將油盡燈枯。但一縷精魂卻徘徊不散，將一個世紀的哀傷留了下來。圖為代表了「左聯」時期的《C夫人肖像》、抗戰時期的《戲劇戰線》（董任過主編），以及集董氏半生研究大成的《說劇》三書的書影，它們幾可概括一個傳奇學者的一生。

跋

本稿十年磨勘，得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垂顧，經年不棄。李昕、翟德芳、孫曉林諸先生尤費心血，其義已遠非編輯之職可喻。筆路藍縷，足以懷之。今拙稿終得成書，諸氏往日之功多焉。跋此，謹以記之。

陸鍵東書於廣州梅花書屋

2016年10月2日